

# 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下的馬來西亞 華人文化建構過程

——以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與  
柔佛古廟為個案（1970—2000）

莊仁傑  
獨立學者

## 提要

過去研究指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運用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元素，作為抗議國家文化政策的武器。但是這些研究主要討論華人文化復興的結果，對於推動文化復興背後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卻無多大著墨。因此，本文以馬來西亞新山華人社會為個案，按時間順序討論1970到2000年之間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如何影響新山的寬柔中學在1970年代以來的擴建工程，以及柔佛古廟及其遊神自1980年代以來的復興。藉此指出當時馬來西亞——特別是新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如何影響華人文化，以及它們如何決定華人文化復興的內容，並一步步形塑文化。這除了進一步完整前人有關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也將着重其中的建構過程，以突顯當時的變化。

**關鍵詞：**華人文化、柔佛古廟、寬柔中學、政治、經濟

---

莊仁傑，獨立學者，電郵：[henry72783@hotmail.com](mailto:henry72783@hotmail.com)。

本文得到科技部111年度的專題研究計畫「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建構過程：以馬來西亞新山柔佛古廟遊神為個案（1970—2000）」（計劃編號：MOST 111-2410-H-003-165）的輔助。

## 一、前言

1969年5月13日的種族衝突事件（即五一三事件）<sup>①</sup>後，馬來西亞政府認為種族間的不平等是衝突的導火線，所以開始推動各種政策以提升馬來人的地位。因此，五一三事件不但是馬來西亞歷史上重要的分水嶺，也影響了馬來西亞接下來50年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

馬來西亞政府在五一三事件之後先後推動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和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以提升馬來族群在各經濟領域的比重，並強調國家文化應該以馬來文和伊斯蘭價值為主。其中1971年頒布的國家文化政策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滿，因此馬來西亞的十五華團在1983年向政府遞呈《國家文化備忘錄》，表達對國家文化政策的不滿。在表達不滿的同時，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在198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檳城的大旗鼓遊行、新山的柔佛古廟遊神、馬來西亞各地的九皇爺誕等再度獲得眾人關注。此外，新近發明的檳城和新山的中秋園遊會、全國華人文化節、華人舞蹈節與二十四節令鼓等，都代表着近40年來的華人文化發展。

簡言之，面對政府對非馬來文化的不友善政策，處於相對弱勢的華人社會運用原有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元素，作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反擊政府國家文化政策，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武器。這就如同當時馬來農村社會中的下層人民面對當地菁英與政府時，運用各種方法來抗衡。<sup>②</sup>但是過去的研究主要討論文化復興的因果——即華人身分與文化認同，以及對國家文化政策的挑戰，對於政治與經濟因素如何一步步影響與形塑文化的過程卻無多大著墨。所以，有必要探討政治與經濟的變動如何一步步影響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過程，使之演變成今日我們所見。

林開忠、DeBernardi 和 Nonini 的研究都指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透過對傳統的改造，以之作為反抗的媒介，表達不滿並反擊與抗議政府的國家文化政

---

① 1969年，馬來西亞舉行第三屆全國大選。在這次的大選中，馬來西亞執政黨聯盟政府無法取得國會三分之二的議席。在野的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取得重大勝利並且在吉隆坡舉行慶祝勝利的遊行，但國陣成員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以下簡稱「巫統」）的黨員也舉行反示威，結果兩派人馬在街頭的衝突，演變成吉隆坡的華人與馬來人的種族衝突，造成大量死亡。這導致馬來西亞進入緊急狀態，民主議會停止運作兩年之後才恢復正常。

②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策。林開忠以華文教育運動為例，討論「現代國家、華人意識與華人文化再創造三者間的關係」。<sup>③</sup>林開忠指出，華文教育運動也是建構「馬來西亞華人的傳統文化」的一環。同華人傳統文化的再興一樣，華文教育是因應國家刺激下的產物。由於馬來西亞中央政府的新經濟政策與國家文化政策，導致馬來西亞華人開始產生文化危機感，認為華人文化應該也是國家文化的一部分。為了回應國家政策，華人除了開始要求政府把華人文化納入國家文化之外，也開始檢視自己的文化，認為應該針對華人文化去蕪存菁。在這樣的情況下，某些華人文化被凸顯。例如鼓吹華人必須使用華語交談，避免使用方言；鼓吹某些認為可代表華人文化的事物，例如書法和舞獅；要求人們改變一些被認為是華人文化的陋習，例如浪費。這股風潮也刺激馬來西亞的華文獨立中學展開獨立中學復興運動（簡稱「獨中復興運動」。另，獨立中學則簡稱「獨中」），這不但從霹靂州(Perak)蔓延到全國，也讓獨立中學一洗1960年代以來的萎靡氛圍，在197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至今。林開忠亦指出，馬來西亞獨立以來，即展開國族建構的工程。但是這工程在1970年代開始走向以馬來人為主，華人逐漸走向邊緣甚至被排除在外。為了對抗中央政府所推動的國族建構政策，馬來西亞華人在華裔商人領袖的領導之下，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族群屬性與華人文化（這些華人文化或族群屬性是原先就已經存在的事物），藉着這些「新的華人文化傳統」與國家政策抗衡。林開忠的著作指出1970年代以來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如何因應政治因素而展開，以及因此所構成的華人身分認同與文化。由於篇幅有限，因此對於華人文化建構過程的敘述較為簡略。此外，雖然其提及霹靂的獨中復興運動，但是這本書主要從全國性的角度切入，對於個別地方的文化活動復興並未有詳細討論。<sup>④</sup>

DeBernardi 的研究以檳城華人的民間宗教為個案，探討檳城華人的宗教習俗與文化。同林開忠一樣，DeBernardi 指出，檳城華人在原有的華人宗教基礎上，不但製造出新的傳統，在舊儀式中也附上深具現代性的目的。在殖民時期，不論任何教育程度與社會階級的檳城華人，都熱衷於參與宗教活動，並且殖民地官員對於接受英文教育的上層華人菁英依舊熱衷宗教活動大

③ 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9），頁2。

④ 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有關傳統的建構與發明，見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O.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感不解。檳城的華人宗教活動不但是當地華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環，也是面對國家威脅時的利器。檳城華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面對國家政權對華人文化的漠視而深感不安，並且擔心有朝一日會像越南華人一樣，在1975年因迫害而必須流亡。因此，檳城華人不但擴大舉辦原有的宗教儀式——例如中元節、九皇大帝誕等——而且讓它們成為團結華人的工具，達到支持教育等現代性目標。例如檳城華人社會組織「檳州慶讚中元委員會」，結合檳城境內各大小中元節慶祝組織，並藉此為當地華社與華文教育籌款，使中元節不但是馬來西亞華人節日與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華社自助與抵抗政府政策的一環。<sup>⑤</sup>

Nonini 的“*Getting By*”以檳城的大山腳華人社會為例，從人類學和歷史學視角討論馬來半島的國家政治，以及華人內部的階級衝突如何形塑文化政治。Nonini 指出，馬來西亞國陣政府及其政策如何把馬來西亞塑造成一個以種族為界線的國家，因此種族政治是歷史產物。他也強調由於種族政治的因素，華人這一種族屬性掩蓋掉華人內部的多元性質（階級與性別等等），以及因此形成的內部差異與衝突。在書中的第九章，他指出大山腳華人社會運用憲法所賦予的宗教自由，賦予當地的中元節慶典和九皇爺誕抵抗政府的意涵。中元節慶典時佔用公共空間，以及九皇爺誕的遊神活動，不但凝結華人的團結意識，也改變對公共空間的運用方式，進而挑戰政府的權威。換言之，面對政府對非馬來文化的不友善政策，處於相對弱勢的華人社會運用原有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元素，使之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反抗政府的國家文化政策，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武器。<sup>⑥</sup> 這就如同當時馬來農村社會中的下層人民面對當地菁英與政府時，運用各種方法來抗衡。<sup>⑦</sup> 雖然 Nonini 的主題是重現華人內部的多元性質與衝突，但也指出政治如何影響華人文化及其外徵。

林開忠、DeBernardi 和 Nonini 的研究詳細指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的結果與原因，但是尚有討論的空間。第一，三位學者的研究主要強調政治如何影響文化，但尚未深入討論經濟因素對文化的影響力。即使談及新經濟政

⑤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⑥ Donald M. Nonini, “*Getting By*”: *Class and State Formation among Chinese in Malay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1-261.

⑦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策如何促成華人的憂患意識，但主要是從政治面討論，並未討論經濟發展與社會逐漸富裕如何影響華人文化。馬來西亞政府自1970年代以來大力推動經濟發展，促成經濟起飛且社會逐步富裕，同時這也是華人文化復興運動展開之時；所以經濟與社會富裕，以及華人文化復興運動二者之間具有關聯性。因此除了政治因素，也必須囊括經濟對文化的影響力，讓文化復興運動的圖像更為完整。第二，他們的研究主要討論的是華人文化復興的結果與原因，但未深入討論華人文化復興運動逐步形成的過程。雖然 Nonini 和 DeBernardi 指出歷史脈絡如何影響各種華人文化，但是對於這些華人文化復興運動的過程則未著墨太多。因此如果按時間順序討論華人文化復興運動如何一步步建立與成形，以及華人文化復興運動如何受到當下的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可以加深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運動的認識。第三，他們所討論的個案以馬來西亞整體華人社會或以馬來半島北方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為主，可是馬來半島幅員遼闊，各地有不一樣的特色和社會脈絡，各地的華人社會也有所不同，無法一概而論。因此以半島北部地區以外的華人社會為個案，討論華人文化復興運動的過程，有助於我們對此運動有更多的了解。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從與馬來半島北方不一樣的馬來半島南部——即包括新山 (Johor Bahru)——的華人社會為個案，討論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如何一步步地形塑當地華人文化。

眾多案例中，位於馬來半島南方的寬柔中學（以下簡稱「寬中」）和柔佛古廟遊神不但獲得許多關注，也是許多研究曾探討過的對象。今日寬中是馬來西亞最大的獨立中學，不但擁有三個校園，同時也是柔佛 (Johor) 南部（簡稱「柔南」）華文教育的象徵。今日柔佛古廟游神是新山華人社會的重大慶典之一，也是國家文化遺產及旅遊部大力推廣的活動。柔佛古廟遊神在1970年代末開始復興，吸引越來越多人參與，至今已經成為逾40萬人參與的活動。由於它們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和宗教活動上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不但被視為馬來半島南部的華文教育與華人文化的重要象徵，也與新山華人社會關係密切，並深受新山華人社會的影響。因此，以它們作為個案，可顯示新山華人文化的建構與變遷過程。（見附圖1）

有關寬中的研究主要圍繞寬中的辦學與新山華人社會的關係。鄭良樹和安煥然所撰寫的《寬柔紀事本末》按照年份敘述寬中的發展；<sup>⑧</sup> 鄭良樹所編

---

⑧ 鄭良樹、安煥然，《寬柔紀事本末》（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5）。

撰的《寬柔論集》則是從不同的個案討論寬中歷屆校長與治校方針。<sup>⑨</sup> 蕭詩平則以寬中和新山華人社會的關係為個案，討論新山華人社會如何在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趨勢中，取得自己的利基與能動性。<sup>⑩</sup> 但是這些研究並未把寬中作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發展的一部分，並藉此討論地方政治與經濟如何影響華人文化的發展。雖然安煥然的討論微微涉及寬中與華人文化的關係，<sup>⑪</sup> 但是並未放入當時經濟與政治變遷中來討論。

過去有關柔佛古廟遊神的研究中，主要強調新山華人社會的內部因素是刺激柔佛古廟遊神復興的關鍵。安煥然指出，1983年《國家文化備忘錄》的出現，刺激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其中新山華人社會也深受影響。柔佛古廟遊神復興、中秋園遊會與二十四節令鼓等文化產品出現，以及各項文化活動的大力推廣（例如全國華人舞蹈節），都可視為新山華人社會對1980年代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覺醒運動的回應和產物。<sup>⑫</sup>

可是，安煥然所強調的古廟遊神復興的原因，並非事情的全貌。雖然提及1971年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推出強調以馬來文化為主的文化政策，並引起華人社會反彈，進而導致華人社會領袖在1983年發表《國家文化備忘錄》以抗衡國家文化政策，反對政府意欲強調的單元文化，主張馬來西亞文化應為多元；但安氏的說法並沒有提及當時新山的地方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讓新山華社擁有抗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本，並運用新山華人社會原有的文化元素與活動，以及訴諸憲法中的宗教自由，進而動員全體新山華人並重新塑造傳統——即柔佛古廟遊神。

莊仁傑曾以柔佛古廟遊神為例，討論地方政治、社會與文化。例如政治元素如何反映甲必丹制度的遺緒和地方華團之間的關係<sup>⑬</sup>、開埠故事的形成

⑨ 鄭良樹，《寬柔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6）。

⑩ 蕭詩平，《邊城堡壘：馬來西亞新山華人的學校與社會》（新竹：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2013）。

⑪ 安煥然，《「文化新山」的邊城風景——戰後馬來西亞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廈門：廈門大學歷史系未刊博士論文，2009）。

⑫ 安煥然，〈馬來西亞柔佛古廟游神的演化及其與華人社會整合的關係〉，《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頁207—211；安煥然，《「文化新山」的邊城風景——戰後馬來西亞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

⑬ 莊仁傑，〈甲必丹制度的現代變奏：以柔佛古廟游神為個案〉，《民俗曲藝》，第212期（2021年），頁1—42；莊仁傑，〈雨傘式組織：以新山華人團體與新山柔佛古廟游神為例〉，《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8卷，第2期（2016年12月），頁49—71。

與傳播，<sup>⑭</sup>以及文化傳統的創新與發明。<sup>⑮</sup>雖然其中有論及古廟遊神復興背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但是沒有深入探討。

如果不溯及新山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因素，就無法了解當時新山華人文化如何建構。所以，本文以馬來西亞新山華人社會為個案，按時間順序討論1970—2000年之間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如何影響新山的寬柔中學在1970年代以來的擴建工程，以及柔佛古廟及其遊神自1980年代以來的復興，指出當時馬來西亞——特別是新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如何影響華人文化，以及它們如何決定華人文化復興的內容，並一步步形塑文化。這除了進一步完善前人有關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也將着重其中的建構過程，以突顯當時的變化。

## 二、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1970—1990）

馬來西亞在1969年爆發的五一三事件，不但改變了馬來西亞，並且對文化產生深刻影響。本節將着重在五一三事件之後柔南政治的變遷，並特別指出新山華人團體與執政中央和柔佛州的國陣政府的關係，為隨後講述文化變動時（第四和第五節的內容）做鋪陳，並指出這些政治活動如何影響文化發展。

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政府更加注重馬來人的身分與地位。原先馬來西亞憲法中的第153條規定，馬來人和原住民的地位和權益受到最高元首保護，並且在教育、商業和就業上受到保障（但是前提不得剝奪他者已經獲得的權益）。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後，這項憲法雖然存在，但是沒有根據此條憲法制定相關法令。五一三事件爆發後，執政黨認為事件導火線的原因之一是馬來西亞各族之間的經濟差距與不平等，因此根據憲法第153條，推動優先優惠馬來族群的國家文化政策和新經濟政策等。

當時的馬來西亞也進一步抹殺政治上的階級意識，進而強調族群之間的關係，並以種族作為政治上的分界線，種族政治自此正式成為主流。自1950年代起，英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政策，而開始禁止階級語言與階級鬥爭的論

<sup>⑭</sup> 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7卷，第2期（2019年10月），頁51—81。

<sup>⑮</sup> 莊仁傑，〈傳統的創新與發明：以新山柔佛古廟游神為例〉，《2017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年刊》，2018年，第1期，頁44—50。

述，導致種族成為政治上的重要分界線及論述方式。這種變化在五一三事件之後變本加厲。因種族衝突而成立的政黨聯盟——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 以下簡稱「國陣」）——不但是以三大族群的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以下簡稱「巫統」）<sup>①⑥</sup>、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以下簡稱「馬華公會」）<sup>①⑦</sup>和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以下簡稱「印度國大黨」）<sup>①⑧</sup>——作為主軸，並使得族群政黨得以繼續擔任政治中的主流。其他強調階級或宗教概念的政黨如人民黨（Parti Rakyat Malaysia）、社會主義黨（Parti Sosialis Malaysia）、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和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 Malaysia）等，逐漸消失或只能敬陪末座，又或者開始使用族群的語言與論述來拉攏選民的支持。<sup>①⑨</sup>在這種情況下，在政治逐漸族群化的後五一三事件時代，代表某個族群的宗教與文化因此被推上浪尖，容易成為新聞焦點。<sup>②⑩</sup>

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在1971年制定國家文化政策，並且規定國家文化應該以馬來文化為主，伊斯蘭文化是國家文化的重要因素。這在當時引起許多華人的不滿，認為其抹除馬來西亞其他種族和文化在國家文化上的重要性。因此，雖然馬來西亞政府試圖從經濟與社會地位上拉拔馬來人，但是卻引起其他族群的反感，甚至加劇種族之間的相互歧視。

五一三事件在吉隆坡爆發時，柔佛相對平靜很多，並未爆發種族衝突。可是五一三事件對新山華人並非完全沒有影響，這可從當時的《新山中華商會慶祝銀禧紀念特刊》中看出端倪。在吉隆坡中華總商會會長拿督黃昆福的賀詞中，提及「商會為適應當前的環境，開始有了重大的改變……一方面關

①⑥ 巫統是馬來西亞的馬來政黨，也是國陣最大的成員黨及領袖，以追求馬來人權益為訴求。於1946年在新山成立，在1957至2018年執政中央。

①⑦ 馬華公會是馬來西亞華人政黨，國陣主要成員黨，以追求華人權益為主。同巫統一起在1957年至2018年執政中央。

①⑧ 印度國大黨是馬來西亞印度人政黨，國陣主要成員黨，以追求印度人權益為主。同巫統一起在1957年至2018年執政中央。

①⑨ Donald M. Nonini, "Getting By": *Class and State Formation among Chinese in Malaysia*, 27-48; Meredith L. Weiss, *The Roots of Resilience: Party Machines and Grassroots Politic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20), 108-153.

②⑩ 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Donald M. Nonini, "Getting By": *Class and State Formation among Chinese in Malaysia*。

心本國政治，協助政府推行國家的新經濟政策」，後又提到「近年來，各地商會皆循着『工商業相輔為經，華巫經濟合作為緯』的路線走去。歷史將證明這條路線是達致親善、團結、和平、安定最短捷徑和正確的路線」。<sup>21</sup>雖然黃氏是吉隆坡人，但是其在文中指出各地商會都依循政府的路線，不敢偏離。同時新山中華商會的發起人宋子廉也指出，馬來西亞的國策是「各民族和諧親善，共進繁榮」，因此新山中華商會不只要為新山華人商業謀福利，也「必須配合當前國策，與巫印各民族『親善和諧，共謀發展』」，如此才能為國家帶來繁榮，鞏固國家的根基。<sup>22</sup>黃、宋二人的言論都不斷強調馬來西亞華商必須遵循政府政策，配合國家的發展方向前進。雖然在公開的論述中有這樣的言論並不特別，但是其中不斷強調必須和其他種族和諧共處，以達到國家繁榮和鞏固國基的目標，都顯示當時馬來西亞的華人商業領袖對於剛剛結束的種族衝突有所恐懼，也擔心政府會因種族衝突而再度展現政府的暴力，推行更為嚴厲打壓華人的政策。

此種害怕政府的心態更可見於1969年新山華團在五一三事件後即刻宣布支持首相的反應。五一三事件的隔日（5月14日），新山中華公會和新山中華商會聯合發出通告，<sup>23</sup>要求大家與政府合作，勿信謠言，奉公守法，並且不可抬高物價。8月21日舉行的新山區各社團代表會議，支持時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領導；並且派出代表，參加於柔佛中部的居鑾(Kluang)所舉行的全柔華人社團代表大會，以支持首相東姑阿都拉曼。<sup>24</sup>這些支持政府的舉動不只局限於新山一地，而是全柔佛甚至全國皆是如此。

當時新山華團表態支持國陣政府不只是出於恐懼，更可能由於長期以來，新山華團與國陣政府關係密切，是國陣政府的重要支持者。由於商業與政治關係密切，因此許多新山華社領袖與政府關係良好，甚至是馬華公會的

<sup>21</sup> 黃昆福，〈適應環境建立親善基礎 祝賀新山中華商會銀禧紀念〉，載新山中華商會編，《新山中華商會慶祝銀禧紀念特刊》，頁13。

<sup>22</sup> 宋子廉，〈檢討過去，策勵未來〉，載新山中華商會編，《新山中華商會慶祝銀禧紀念特刊》（新山：新山中華商會，1970），頁16。

<sup>23</sup> 1922年成立的華僑公所，在二戰後分為新山中華公會與新山中華商會。新山中華公會成為新山華人的領袖團體與代表，新山中華商會則以處理新山華商事務為主，並成為中華公會的會員。見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頁55—56；莊仁傑，〈雨傘式組織：以新山華人團體與新山柔佛古廟遊神為例〉。

<sup>24</sup> 新山中華商會編，《新山中華商會慶祝銀禧紀念特刊》，頁67。

成員。例如黃樹芬、郭鶴堯、張愈昌、陳寶錦等新山華人領袖同時也是馬華公會的成員。<sup>25</sup>時至今日，依舊有許多中華公會高層和會員，與國陣成員黨——馬華公會——過從甚密，甚至是馬華公會的黨員。<sup>26</sup>同時在新山中華公會每年農曆大年初一舉行的團拜，柔佛州州務大臣都會親自或派代表出席。因此，新山華團向來是國陣的重要支持者。

不僅新山華團本身與國陣政府的高層關係緊密，新山華團還維繫新山一般的華人大眾對國陣政府提供支持。雖然今日新山華團對新山華人社會政治傾向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是在20世紀最後的30年，新山華團主導甚至壟斷新山華人大眾與政府打交道的管道。例如他們決定人們能夠和哪些政黨接觸、接收哪些訊息，進而影響人們的投票行為。<sup>27</sup>

如此情況下，新山成為國陣政府的票倉。在1970—2000年之間，柔佛南部的6個國會選區與13個州選區並未出現在野黨議員，長期由國陣政府所把持。即使是在1999年，在野黨夾着烈火莫熄運動(Refomasi)的旋風，大力動搖馬來半島中部、北部與東海岸的選情，但柔佛仍然由國陣橫掃柔佛州所有國州議席。<sup>28</sup>可是這些並未代表新山華團與政府的關係一帆風順。1980至2000年間柔佛古廟山門事件的爭議，常常使得政府與新山華團關係緊張。這部分將留待第五節再詳細敘述與分析。

簡言之，雖然1969年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新山華團積極表態支持政府可說出於恐懼，但從新山華團與國陣政府的長期關係來說，兩者不但關係良好，甚至部分人員也有所重疊。今日新山華團對一般大眾政治傾向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是在本研究所探討的20世紀最後30年，新山華團的影響力頗為巨大，是政府與新山華人社會之間的重要管道（至今仍然具有此功能）。雖

<sup>25</sup> 〈新山馬華決通函各區會提出州議員候選人執行秘書羅嘉言辭職受挽留〉，《南洋商報》，1959年2月18日，版12；〈新山東區馬華公會議決支持敦拉薩陳修仗〉，《星洲日報》，1971年6月4日，版9。

<sup>26</sup> 莊仁傑，〈網路與地方經濟社會因素對選舉的衝擊——以馬來西亞的柔南選區為例（2008—2018）〉，《臺灣民主季刊》，2002年，第17卷第3期，頁101—152；莊仁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與政治參與調查：以柔南地區華人社會為例〉，載賈益民、張禹東、莊國土等主編，《華僑華人藍皮書：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262—283。

<sup>27</sup> 莊仁傑，〈網路與地方經濟社會因素對選舉的衝擊——以馬來西亞的柔南選區為例（2008—2018）〉；莊仁傑，〈甲必丹制度的現代變奏：以柔佛古廟游神為個案〉；莊仁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與政治參與調查——以柔南地區華人社會為例〉。

<sup>28</sup> 莊仁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與政治參與調查——以柔南地區華人社會為例〉。

然總體上兩者關係良好，但是新山華團與政府之間仍有些時候因為柔佛古廟的事情而關係緊張。

### 三、柔佛南部的經濟發展（1970—1990）

柔佛南部的經濟自1970年代起有長足發展，從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一個工業具有重要地位的地方，也一躍成為馬來西亞第二大人口集中地區。本節將着重柔佛南部自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以及其所促成的人口變遷，並從此出發，在第四和第五節中指出這些經濟變遷如何促成文化變動。

五一三事件之後，馬來西亞中央政府自1970年開始推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強調扶貧，並且認為馬來人等土著(Bumiputra)較其他族群貧窮，因此新經濟政策旨在提升土著的經濟參與度，以縮小土著與其他族群在經濟上的差距。這項政策雖然以扶貧為目標，特別是幫助貧困的馬來人，但實際上主要的受惠者是與巫統有關係的人，特別是高官顯要。<sup>29</sup> 另一方面，雖然這項經濟政策以提升經濟總量的方式來扶貧，但是當經濟不景氣時，原先以增加的利益來扶貧的計劃就會受阻，再加上新經濟政策主要是扶持馬來人，因此使得華人等認為政策不公。<sup>30</sup>

除了中央政府撥款與推行各種經濟發展計劃以利柔佛州經濟發展之外，柔佛州政府也在1968年成立柔佛州經濟發展機構(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Johor S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up>31</sup>，作為統籌並推動柔佛州經濟發展的州政府臂膀。1974年柔佛州經濟發展機構改組，在主席之下，另設3位副主席管理7個部門。第一副主席管理工程部及資產和土地部，並且主導機構的執行與運作情況；第二副主席管理金融部、設計與關係部及管理部，負責各項發展計劃與項目；第三副主席主導農業/森林部及管理一土著部，負責各項計劃的執行與管理。<sup>32</sup> 在這種情況下，柔佛州獲得中央政府與州政府注資，大力發展經濟，特別是柔佛南部經濟自1970

<sup>29</sup>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53-54.

<sup>30</sup> Donald M. Nonini, "Getting By": *Class and State Formation among Chinese in Malaysia*, 235-239.

<sup>31</sup> 柔佛州經濟發展機構即為今日的柔佛機構(Johor Corporation)。

<sup>32</sup>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dikan oleh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598.

年代開始快速發展。

1971至1975年之間的第二大馬計劃即以落實新經濟政策為目標。在第二大馬計劃中，馬來西亞中央政府積極推動全國各地的工業發展，避免把工業部門都集中在雪蘭莪州(Selangor)。當第二大馬計劃結束時，雪蘭莪的工業產值(Manufacturing output)下降到46%，柔佛州則佔全國工業產值的12%，不但與霹靂州平起平坐，並且只落後於檳城(Penang)和雪蘭莪(佔15%)。<sup>33</sup>

在第二大馬計劃下，柔佛經濟發展的重心是發展工業。政府在 Tanjung Agas、Tongkang Pecah 和巴西古當(Pasir Gudang)設置工業區以推動工業發展。其中巴西古當是唯一地處柔佛南部，並靠近新山的工業區。巴西古當與柔佛州另兩個工業區不同，它擁有巴西古當海港且鄰近新加坡，因此不但是一個以石化工業、造船業等為主的重工業中心，也是柔佛南部的物流與運輸中心。因此巴西古當較 Tanjung Agas 和 Tongkang Pecah 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和資源，例如在1974年柔佛州新增的777英畝工業用土地，其中673英畝為巴西古當工業區。<sup>34</sup>（見附圖2和附圖3）

此時的巴西古當工業區吸引許多外資和本土企業入駐。在1974年，一共有38所企業申請進駐巴西古當工業區，其中15所已經通過申請。這為巴西古當提供了8000個工作機會，以及高達馬幣2.371億元的投資。<sup>35</sup>

巴西古當在1970年代初建好港口設備並啟用，成為馬來西亞南部的工業與運輸中心，也是馬來西亞南部門戶。有鑑於巴西古當港口的迅速發展，政府很快在1979年進一步計劃擴大其港口設施，可見政府對於巴西古當港口的重視。巴西古當海關將增設雨蓋檢查站，以利雨天時檢查進出貨品，提高貨物的檢查效率，並使得海關得以全天運作，不受天氣影響。<sup>36</sup>

另一方面，政府也進一步擴建駁船碼頭和倉庫，以應付巴西古當港口日

<sup>33</sup>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Third Malaysia Plan*, 205-208, <https://www.ekonomi.gov.my/en/economic-developments/development-plans/rmk/third-malaysia-plan-1976-1980>.

<sup>34</sup>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sup>35</sup>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sup>36</sup> “Kertas Kerjia Bil: Additional funds for four new projects at Johor Port,” Jawatankuasa Kecil Anggaran Perbelanjaan Bagi J. P. P. N.,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1/0084644;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lan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6.

漸增加的吞吐量。在這些增建當中，最關鍵的是增設專門負責危險物品裝卸的第二碼頭及相關設施。港口初期工程所建設的液體輸送與存儲設施主要用於儲存棕油與食用油，因此為了日後巴西古當工業區的發展，必須要建設能夠輸送石油等危險化學液體的設施。最後在政府規劃下，建設能夠承受溫度較高的液體化學品的港口設施，並且第二碼頭的建設地點必須遠離其他地方。當時巴西古當工業區開始發展成石油提煉中心，其中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開始在巴西古當設廠，因此急需相關建設。此外，這項計劃亦可吸引其他石油公司不在新加坡設廠，而前往巴西古當設置石油工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因此，這項工程能夠加強與提升巴西古當在石化工業方面的重要性，為未來進一步擴大巴西古當的工業潛能。<sup>37</sup> 該擴建計劃不但加強巴西古當的運輸重要性，讓其成為南方的門戶與工業重鎮，也使巴西古當工業區成為柔佛南部重要的石油提煉中心。

另一方面，柔佛州政府不只是計劃建立巴西古當工業區與碼頭，同時也計劃建立一個住宅區，為那些因為工業發展而到當地落戶的人們提供住宅。在巴西古當積極發展工業與港口時，州政府規劃巴西古當市中心，提供2146英畝的土地建設房屋。政府提供馬幣520萬元，建設1000所房屋供巴西古當工人居住。<sup>38</sup> 當時巴西古當的住宅區除了少部分是政府興建的公務員宿舍之外，大部分房屋由民間企業在政府規劃地興建與售賣。由於許多來到巴西古當工作的是單身人士與一般大眾，所以政府也為此設定購屋計畫，要求建築公司遵守。例如規定建築公司所售賣的房屋價格必須在合理範圍內，並且允許購買者先繳付20%的首付款，隨後以20年的時間攤還剩餘款項。<sup>39</sup>

<sup>37</sup> “Kertas Kerja Bil: Additional funds for four new projects at Johor Port,” Jawatankuasa Kecil Anggaran Perbelanjaan Bagi J. P. P. N.,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1/0084644;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lan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6.

<sup>38</sup>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sup>39</sup>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dikan oleh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598;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lan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6.

1974年，柔佛士乃機場（Senai Airport）落成，並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在第二大馬計劃中，柔佛州選擇靠近新山的士乃（Senai）興建機場。結果促使一些商家選擇在機場附近興建廠房，依賴空運輸送原料與商品。因此，政府參考檳城和雪蘭莪政府的做法，在鄰近機場的土地中規劃出一處99英畝的土地作為自由貿易區，並且讓此區的商品免除進出口稅。<sup>④</sup>（見附圖2和附圖4）

政府對此自由貿易區有非常詳細的規劃。政府計劃建設一道10尺高的圍牆，並設置兩個出入口，由海關人員把守。這除了是為免稅措施所做的規劃，也是為了解決商品遭盜竊等問題。同時政府也進行道路規劃，把貿易區分隔為一個個小區，以便於管理與發展。由於士乃自由貿易區可提供多達5000個工作機會，所以政府也在附近規劃建設房屋，供自由貿易區的員工居住。<sup>④</sup>

柔南工業區的外溢效應立竿見影。淡杯（Tampoi）和拉慶（Larkin）等地也被帶動起來，開始發展工商業。在淡杯，出現一所玩具製造廠，並招聘來自香港的技師。<sup>④</sup>在拉慶的Dato Jaafar路（Jalan Dato Jaafar），政府建設新的商店，鼓勵當地馬來族群租聘或購買以從事小型商業。這些雙層商店，第一層租金每月300元，第二層租金每月200元；並且政府規定，如果企業可持續經營3年，則可買下這間店面。<sup>④</sup>從中可見，當時柔佛州多個地區不斷發展工商業，經濟快速發展。<sup>④</sup>

雖然工業比重加重，但是農業在1970年代的柔佛州仍然是最重要的行業，並且柔佛州有超過50%的人口從事農業或者相關行業。雖然巴西古當、

④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dikan oleh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598.

④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dikan oleh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598.

④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④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④ 黃復生，〈論發展工業〉，載新山中華商會編，《新山中華商會慶祝銀禧紀念特刊》，頁14；“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lan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6。

淡杯和拉慶的工業區不斷擴建與發展，但是與農業相關的工業仍然不少，並且提供許多就業機會。例如在新山與巴西古當之間的地不佬(Tebrau)地區就有好些農業用地，種植大量橡膠和油棕。同時也有許多工廠，從事農產品加工行業。<sup>④5</sup>

另一方面，柔佛州旅遊業在1970年代也有所發展。當年共有1,080,720名遊客來到馬來西亞，其中有34%——即367,469人——是從新山入境的（透過水路或陸路交通）；其中共有339,651透過陸路過境，因此可知是從新加坡過來。來訪的遊客來自英國、澳洲、紐西蘭等地，其中來自亞細安(ASEAN)<sup>④6</sup>的遊客最多，高達109,034人，共佔拜訪柔佛遊客的32.1%。<sup>④7</sup>

在1970年代，可看到馬來西亞和柔佛州的經濟都不斷增長。柔佛州在1971年的GDP為馬幣1,476元，在1980年代增長到2,941元，年增長率為8%。個人GDP則從1971年的1,083.7元增長到1980年的1,726元，年增長率平均為5.3%。同一時期（1970年代），馬來西亞的全國GDP年增長率平均為7.8%，從1971年的13,016元增長到26,188元。另一方面，國家的貧窮率從1970年的49.3%降低到1980年的29.2%。同時各族之間的收入差距減少、就業率提升（平均每年增長4.1%）。整體而言，新經濟計劃在當時奏效，國家經濟成長，並且縮小種族之間的經濟差距。<sup>④8</sup>

當中央和柔佛政府大力發展柔佛經濟時，新山經濟也蓬勃發展。在第二和第三大馬計劃中，推動發展馬來半島南部的經濟是重要目標。<sup>④9</sup>在當時，新山西邊的巴西古當和北邊的士乃，都因為海港與機場，以及當地的工業發

④5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④6 當時的亞細安只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和菲律賓。

④7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④8 “Urban Transport Master Plan Study for the Johor Bahru Conurbation Malaysia, Technical Report 5, Socio-Economic Study,”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Government of Malaysia, <https://openjicareport.jica.go.jp/pdf/10694826.pdf>;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Fifth Malaysia Plan*, <https://www.ekonomi.gov.my/en/economic-developments/development-plans/rmk/fifth-malaysia-plan-1986-1990>.

④9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Second Malaysia Plan*, <https://www.ekonomi.gov.my/en/economic-developments/development-plans/rmk/second-malaysia-plan-1971-1975>;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Third Malaysia Plan*, <https://www.ekonomi.gov.my/en/economic-developments/development-plans/rmk/third-malaysia-plan-1976-1980>.

展，從而帶動新山的發展。在第五大馬計劃中，甚至強調新山和巴西古當所構成的城市帶，可見兩者的關係非常緊密。<sup>⑤⑩</sup>

新山在政府的經濟規劃中，主要是從事第二和第三級產業。由於新山靠近新加坡，而且鄰近士乃和巴西古當，所以一部分的第二級產業也規劃在新山的市郊，如地不佬、淡杯和拉慶。同時因為新山恰好位於柔南的中心位置，並且是歷史較為悠久的已開發地區，所以柔南的貿易、金融與服務業都集中在此地區，為北至士乃，西至巴西古當，東至振林山等地的農工商業提供第三級產業的商貿與金融等服務。從當時規劃中，辦公大樓在新山大量興建以應付當時所需，可見新山因應周圍地區的工商業而蓬勃發展。<sup>⑪</sup>

在新山的發展計劃中，敦拉薩大廈(Kompleks Tun Abdul Razak)被視為政府計劃的重要指標之一。政府在市中心的新山亞福街(Jalan Wong Ah Fook)和敦拉薩路(Jalan Tun Abdul Razak)之間，建立一座新的購物中心與辦公大樓，並以當時剛過世的前首相敦拉薩(Tun Abdul Razak Hussein)命名。這座建築物將有一棟3層樓高的購物中心，以及23層樓高的辦公大樓。其中前者在1973年7月動工，後者則在1977年11月動工，並預計1978年完工。<sup>⑫</sup>

與敦拉薩大廈同一時期在新山興建的購物中心與辦公樓，還有位於火車站路(Jalan Station)和敦拉薩路交界的美倫大廈(Merlin Tower)，以及位於義興路(Jalan Ngee Heng)和Jalan Gereja之間的劉南輝大廈(Johor Tower)。但是敦拉薩大廈是由政府出資興建；美倫大廈和劉南輝大廈則由私人企業出資興建，其中前者由陳錦泉興建，後者由劉南輝興建。

1970年代初，新山購物中心只有美倫大廈（位於今天新山關卡附近），並且其附設的辦公大樓也是當時新山最高的建築。因此政府認為房地產方面仍有發展空間，決定建造敦拉薩大廈。當時新山的房地產價格較新加坡和吉隆坡便宜。1974年吉隆坡的商店價格每平方介於225至300元之間，新加坡則

⑩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Fifth Malaysia Plan*, <https://www.ekonomi.gov.my/en/economic-developments/development-plans/rmk/fifth-malaysia-plan-1986-1990>.

⑪ “Urban Transport Master Plan Study for the Johor Bahru Conurbation Malaysia. Technical Report 6, Land Use Study,”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Government of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5/0009170;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Fifth Malaysia Plan*, <https://www.ekonomi.gov.my/en/economic-developments/development-plans/rmk/fifth-malaysia-plan-1986-1990>.

⑫ “Cadangan untuk Menjual (lease) sebahagian dari Kompleks Tun Abdul Razak,”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5.

為250到350元之間；吉隆坡的辦公樓的價格每平方介於130到180元之間，新加坡的辦公樓則介於150到200元之間。相比之下，當時的新山並未有許多高樓大廈，房地產價格相對便宜很多，因此政府認為敦拉薩大廈將有利可圖。<sup>⑤③</sup>

雖然如此，但是敦拉薩大廈的構想卻也籠罩着種族主義的影子。當時是新經濟計劃時期，因此強調土著優先。所以，敦拉薩大廈的計劃將保留部分店面供馬來人/土著租憑或買下。敦拉薩大廈一共有80間店面，其中49間將租給土著，23間給非土著，8間由土著和非土著合作租下。即使在1977年的報告中表明有29間店面尚未出租，政府仍然沿用種族主義的方式處理。其中17間將繼續承租給土著，4間給非土著，1間給土著—非土著，7間作為辦公室。<sup>⑤④</sup>此外，當時給予土著租戶每月減免30%的租金，同時如果購買店面，預付款只需要3個月的租金；相對的，非土著則沒有租金減免的優惠，而且如果購買店面，預付款是6年的租金。<sup>⑤⑤</sup>雖然敦拉薩大廈這項計劃後來順利完成，並成為當地的購物中心。可是當時按照新經濟政策的規定，以種族作為分配比例，預示着種族主義的思維入侵到了新山的經濟領域。

隨着經濟成長，新山的人口也將隨之增加。根據人口統計，柔佛州人口在1981年有1,689,300人，1991年達到2,188,100人，2001年達到2,829,900人。在1981年，柔佛州華人人口有648,200人，到了1991年增長到762,700人，到了2001年增長到939,100人。<sup>⑤⑥</sup>從199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中，可看見新山縣擁有704,471人；其中有342,373名土著（包括馬來人，48.6%），

---

⑤③ “Cadangan untuk Menjual (lease) sebahagian dari Kompleks Tun Abdul Razak,”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5.

⑤④ “Cadangan untuk Menjual (lease) sebahagian dari Kompleks Tun Abdul Razak,”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5;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lan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6.

⑤⑤ “Cadangan untuk Menjual (lease) sebahagian dari Kompleks Tun Abdul Razak,”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5.

⑤⑥ Population Table: States,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state?state=johor&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state?state=johor&visual=table).

270,517名華人(38.4%)，67,629名印度人(9.6%)。<sup>57</sup> 在2021年的數字中，可看見新山人口有905,600人，其中馬來人有413,200人(46%)，華人有312,600人(34%)，印度人有73,300人(8%)。<sup>58</sup> 2021年的古來縣人口有328,200人，其中馬來人153,800人(47%)，華人95,700人(29%)，印度人30,400人(9%)。<sup>59</sup> 與全國總人口相比，可見柔佛州華人人人口比例高於全國，新山與古來地區(即大新山地區)華人人人口比例也高於全國。(見附表1、2)

另一方面，隨着霹靂等地的礦產萎縮，許多人來到新山與新加坡尋求工作機會，也刺激新山的人口成長，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換言之，新山的經濟與人口成長互為因果，不斷地相互刺激與成長。

因應中央與柔佛州政府積極發展柔佛經濟，新山各地開始湧入大量人口，並促成許多住宅區的形成。除了政府在淡杯、拉慶和巴西古當建設大量房屋之外，<sup>60</sup> 新山的世紀花園(Century Garden/Taman Abad)在1970年代開始建設較為平價的房屋；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新山市中心附近的大馬花園(Taman Sri Tebrau)和彩虹花園(Taman Pelangi)，以及位於市郊的皇后花園(Taman Ungku Tun Aminah)、東方花園(Taman Skudai Baru)、柏伶花園(Taman Perling)和柔佛再也(Johor Jaya)等大型住宅區也開始建設，以滿足新山人口大量增加所促成的房屋需求。到了1990年代，百合花園(Taman Molek)等新住宅區計劃仍不斷繼續開發。至今，新山的住宅區開發計劃方興未艾，新山市郊仍不斷建設新住宅，甚至擴展至振林山與古來等地。(見附圖5)

<sup>57</sup>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1991,”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1/0001046.

<sup>58</sup> Population Tabl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Johor Bahru),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johor-bahru&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johor-bahru&visual=table).

<sup>59</sup> 古來縣原先是新山縣的一部分，直到2008年才獨立成縣。為進行比較，因此把古來縣人口也列入。Population Tabl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Kulai),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kulai&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kulai&visual=table).

<sup>60</sup> “Projek Pertanian/Perhutanan/Perlombo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0;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dikan oleh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598; “Laporan Kemajuan Projek-projek dan Kegiatan-kegiatan yang Dijalan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Joh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0/0016606.

簡言之，自1970年開始，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和柔佛州政府都積極投資柔佛州，特別是柔佛南部地區。在這期間，巴西古當和士乃因海運和空運而成為重要工業區，也帶動柔南地區各處的工商業發展。作為柔佛首府與柔南地區的最大城市，新山不但成為柔南的工商業中心，也在政府的經濟發展下，為其他地區提供第三級產業的服務（商貿、金融與服務業）。

新山自這時時期開始大興土木，不論是政府資助的敦拉薩大廈或私人建造的美倫大廈和劉南輝大廈都在1970年代落成。這不但改變新山市區的景觀，同時也象徵着新山經濟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這時政府的新經濟政策也開始深入民間，從敦拉薩大廈保留給土著及為土著租戶提供較低的租金，就可略知一二。這些經濟上的變遷，也將聯合當時的政治變化，影響新山華人文化。

#### 四、新山寬柔中學的擴建計劃（1970—2000）

本節將以新山寬柔中學自1970年至2000年之間校舍擴建計劃的過程，指出新山政治與經濟變遷，如何促成寬中學生人數暴增，進而促成擴建校舍並形成影響新山華人文化的重要象徵——寬柔中學。寬柔學校在1913年設立，最初只有小學，後來在1951年和1955年分別設立初中部與高中部，中學於焉形成。1957年底，寬中公開拒絕接受改制成為政府資助的中學並施行政府的教育制度，而成為獨立於政府體制之外、完全由私人辦學的獨立中學。<sup>①</sup>（見附圖1）

國家教育政策是促成寬中人數暴漲的原因之一。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推動《1967年國語法案》和《1961年教育法令》，促成各所中學逐步改為以馬來文教學。這促使一些要求小孩接受華文教育的華人家長不再送小孩去公立中學就讀，而把孩子改送到私立中學。再加上新山的公立中學成績突出的不多，因此許多華人家長傾向於把孩子送往獨立中學，促成寬中人數暴增。另一方面，在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之後，族群的分界日益加強。如第二和第三節所示，1969年之後，政治上許多強調階級的跨族群政黨漸漸消失，種族政黨一枝獨秀，種族劃分也成為政黨政治的主軸；經濟上，隨着新經濟政策的

<sup>①</sup> 有關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改制，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1），第3分冊，頁392—442。

推行，進一步強化以族群作為經濟群體的界線劃分。<sup>62</sup> 再加上單一文化政策強調伊斯蘭與馬來文化，促成華人對於華人文化的憂患意識日益增加，因此對能夠保留華人文化的獨中的好感日益加強，進而把孩子送往獨中就讀。

新山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也是促成寬中人數不斷增長的原因。如第三節所述，新山在1970年代積極發展，除了政府資助外，許多民間企業在這時期蓬勃發展。例如劉南輝和陳錦泉在1970年代分別建造美倫大廈和劉南輝大廈，可視為民間企業蓬勃發展的象徵。這些發展創造許多工作機會，吸引外地人到新山定居與工作。例如訪談人 K 表示，其父親在1970年代從霹靂州南下到新山工作與定居，並成為新山人。<sup>63</sup> 訪談人 L 的父親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從雪蘭莪州來到柔南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定居與工作，並在當地結婚生子，2010年再遷往新山定居。<sup>64</sup> 這些都一再顯示，當時柔南地區有許多工作機會，並促成新山人口大增。

當時也出現一群在新加坡工作但定居新山的群體，促成新山人口增長。當時新加坡也開始經濟轉型，製造業成為重要產業，並吸引許多馬來西亞勞動力到新加坡工作。<sup>65</sup> 除了新山華人，許多來自馬來半島中北部的華人也因為故鄉的推力與新加坡的拉力，而到新加坡工作。其中有許多人選擇定居在新山，並每天通勤往返新加坡與新山。<sup>66</sup> 例如訪談人 B 的父母在197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工作，並在新加坡成立家庭，直到1990年代才返回新山定居（但父親仍在新加坡工作，後來才返回新山工作）。<sup>67</sup> 經濟的發展促成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如第三節所示，柔佛州華人人口從1981年的648,200人，增加到

<sup>62</sup> Donald M. Nonini, "Getting By": *Class and State Formation among Chinese in Malaysia*, 125-149; 林開忠, 《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頁104—112。

<sup>63</sup> 訪談人 K 是在土生土長的新山人，一家已經在新山居住多年，下一代也在新山出生長大。但是他的父親來自北馬的霹靂，母親則是柔佛人。訪談記錄：K，2023年9月22—30日，網絡通訊。

<sup>64</sup> 訪談人 L 是土生土長的新山人，現在一些家庭成員在新加坡工作，但定居新山。訪談記錄：L，2023年9月22—30日，網絡通訊。

<sup>65</sup> 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著，林添貴譯，《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23），頁332—382。

<sup>66</sup> 例如許多父執輩在1980年代時即為定居新山的新加坡勞工，至今仍有許多人如此每天通勤往返兩地。

<sup>67</sup> 訪談人 B 雖在新加坡出生但是在新山長大，一家在新山居住多年。訪談記錄：B，2023年9月22—30日，網絡通訊。

1991年的762,700人，到了2001年更增長到939,100人。<sup>68</sup> 其中新山華人人口從1991年的270,516人，增加到2021年的312,600人。<sup>69</sup> 如果加入古來縣的華人人口（古來於2008年從新山縣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縣），2021年的大新山地區的華人口達到408,300人。<sup>70</sup> 因為新加坡和新山的經濟起飛，促成新山人口增加，新山華人人數也隨之增加，進而導致寬中人數急速增長。

因應人數激增的情況，寬中開始展開擴建計劃。從1970年開始，寬中人數從1,250人上漲到1980年的4,154人。雖然進入1980年代和1990年代後增幅開始放緩，但是到2000年時，寬中學生人數仍上漲到6,650人。<sup>71</sup>（見附表3）1974年6月9日，新山中華公會理事長劉南輝召開新山華人註冊社團聯席會議，要求新山與古來<sup>72</sup>各華人團體，例如新山中華商會、古來中華商會、柔佛潮州八邑會館、新山福建會館、新山廣肇會館、新山瓊州會館等等，一同為寬中籌募教育基金，以支應寬中建設校舍的巨大開支。在會議上成立以新山中華公會為首的「新山中華公會聯合九華團籌募寬柔中學發展基金」，分配各個團體一定的募款數額為寬中籌款。<sup>73</sup> 至1983年為止，一共有96個團體參與這募款計劃，在劉南輝和郭鶴堯的先後帶領下為寬中籌募建校基金。<sup>74</sup>

寬中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發展可分為4期。第一期的發展是從1973年到1976年，拆除過去的食堂，改建一座4層樓高的圖書科學樓。除了一樓的食堂，其餘樓層作為圖書館、教室和理科實驗室。第二期的發展是從1977年到1978年，拆除教職員宿舍與4間教室，建立4層樓高的L型工藝中心大樓，包括科學實驗室、講堂和30間教室。第三期是在1979到1982年間建立蕭畹香

<sup>68</sup> Population Table: States,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state?state=johor&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state?state=johor&visual=table).

<sup>69</sup>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1991,”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1/0001046; Population Tabl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Johor Bahru),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johor-bahru&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johor-bahru&visual=table).

<sup>70</sup> Population Tabl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Kulai),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kulai&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kulai&visual=table).

<sup>71</sup> 鄭良樹、安煥然，《寬柔紀事本末》，頁306。

<sup>72</sup> 當時的古來尚屬新山縣的一部分，2008年才獨立成縣。

<sup>73</sup>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新山：新山中華公會，1983），頁215—216。

<sup>74</sup>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頁16。

樓。蕭畹香樓樓高4層，並有24間教室。第四期是在1984到1988年間建立莊新培圖書樓。這棟大樓除了底層的食堂、一樓的會議廳和講堂之外，還包括一間2層樓的圖書館。<sup>⑤</sup> 這些計劃奠定今日新山寬柔中學的基礎，使得寬中成為一所可容納多達六七千學生的大型獨中。

新山華人社會因為寬中長達20年增建校舍的籌款運動而整體動員，不但顯示寬中是1970年代新山華人社會在文化發展上的焦點，也體現新山華人社會因為經濟起飛，所以有龐大財力供養寬中。第一期工程的捐款名單中有許多從事建築業的富商，他們當時所建造的住宅區幾乎涵蓋新山大部分地區。在名單中排名第一位的是郭氏家族掌控的郭兄弟私人有限公司，它們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建設新山的柏伶花園和彩虹花園。郭氏家族原先即為新山的華人富商家庭；在20世紀時家族歷代有代表積極參與新山華人社會的事務。<sup>⑥</sup> 郭氏家族在寬中歷次捐款活動中捐款甚多；在1990年代末，郭鶴年捐助寬中建設學生宿舍大樓，並以其母親鄭格如女士命名。

除了郭氏家族，也有其他新山重要華商捐助寬中。蕭畹香在第一期工程中也捐助5萬元。蕭畹香不但曾經擔任寬中董事長，也是新山和昌父公司的發起人與代表。他投資新山的地產開發，以金山園(Taman Impian Emas)為代表。陳錦泉是陳錦泉實業的創辦人，不但建設美倫大廈，也投資新山各個地產開發項目。劉南輝是漢聯機構的創辦人與掌權者，從種植業與房地產業中取得大量利益。鄭鏡鴻的名字也出現在第一期工程的捐款名單中。鄭鏡鴻多次捐助寬中，也積極投入新山房地產開發；其所掌控的大馬集團，曾先後開發新山好幾個重要的住宅區——大馬花園、大豐花園和柔佛再也等。<sup>⑦</sup>

雖然這些捐款的富商在1970年代之前已經有所成就，但是他們在1970到2000年之間因為新山飛躍性的成長而變得更富有。例如鄭鏡鴻、蕭畹香和郭

⑤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頁19—21、43—44、80—83；鄭良樹、安煥然，《寬柔紀事本末》，頁311—319。

⑥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頁24—30。但是自郭鶴堯過世後，郭氏家族就無代表參與新山華人社會的公共事務。

⑦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頁24—30。

氏家族這一時期在新山開發大量房地產項目，並賺取大筆財富。許多與建築業相關的商業活動也因此興旺。例如在第二期工程的捐贈名單中，可見柔佛木器與建築有限公司、柔佛州火鋸廠商公會和柔佛華人建築商公會等與建築相關的公司與團體捐助寬中。<sup>78</sup>

雖然這些富裕華商捐贈寬中甚多，並且他們或其家族代表活躍於新山各個華團中，但是他們的名字卻很少出現在與柔佛古廟有關的活動中。這主要原因是柔佛古廟及其遊神活動在1980年代之前，未獲得新山華社菁英太多關注，並且當時許多華人領袖認為古廟遊神活動不入流。例如劉南輝1978年在一場為寬柔中學籌款的晚宴上（寬中之夜），就柔佛古廟遊神一事發言指出：「希望各會館年輕一輩應該立倡消除幫派<sup>79</sup>的落伍思想以協助華人社會的進步，而中華公會理監事會亦應討論如何改善遊神的節目內容，使之不要具有濃厚的幫派色彩。辦事可行，還需一段時日，希望大家提供高見，以匡不逮」。<sup>80</sup>從此來看，1970年代新山柔佛古廟及其遊神並未獲得新山華人菁英的青睞，因此其對古廟活動保持一些距離。

簡言之，1970年代新山華人文化的發展可從寬中的發展中得知一二。由於當時新加坡和新山經濟起飛，促使新山人口增加，華人人數隨之上升；加上政府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走向偏重伊斯蘭與馬來文化，導致華人社會產生文化焦慮，促成許多華人把小孩送往新山當地唯一的獨中——寬柔中學——就讀。因此，寬中人數暴增，進而促成新山華人社會領袖劉南輝等人率領新山華社菁英為寬中籌募發展基金。從這些捐助名單可知，當時不少富商從事與建築相關的行業，他們不在此前已經富甲一方，更因為新山人口暴增而大發利市（他們所建設的住宅區幾乎涵蓋新山大部分地區）。所以，如果沒有當時的政治與經濟變遷，進而促成新山華人人人口急速增長，寬中的人數將不會激增；如果新山經濟沒有成長並使許多富商有足夠財力支持寬中，寬中也無法募得大筆款項擴建校園。

<sup>78</sup>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頁45—50。

<sup>79</sup> 劉南輝在演講中所說的「幫派」指的是新馬地區的方言群，如潮州、福建、客家、廣肇與海南等。

<sup>80</sup> 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編委會，《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籌募寬柔中小學發展基金史實專輯》，頁56。

## 五、柔佛古廟遊神

本節將着重在柔佛古廟及其遊神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變遷，並指出它的變化如何受到當時政治與經濟的影響。

柔佛古廟在1970年代之前並未受到新山華人社會菁英的垂青。雖然柔佛古廟是新山中華公會的資產，設有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廟管委會」）負責其運作，但其實際運作卻是交由廟祝負責，直到1996年才由古廟管委會直接管理。<sup>①</sup>

1980年代的古廟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地方。柔佛古廟位於新山直律街（Jalan Tuas），背靠甘榜彭亨（Kampung Pahang）。當時的甘榜彭亨是新山一處龍蛇混雜、充滿犯罪的貧民窟；其不但是犯罪溫床，也充滿娼妓與毒品，因而一直被視為一個危險的地方。<sup>②</sup> 新山警方曾多次在甘榜彭亨掃蕩，逮捕多名娼妓並沒收毒品，甚至曾在當地查獲槍械，逮捕受傷且涉嫌私會黨械鬥的通緝犯。<sup>③</sup> 因此，鄰近甘榜彭亨的柔佛古廟也非一處清淨之地。根據1985年的報導，有許多吸毒者進出柔佛古廟的風雨聖者亭，只有在初一、十五人聲鼎沸之際，他們才會移往他處。<sup>④</sup> 即使進入1990年代，柔佛古廟也因為地方幽靜，少人前來，所以仍有許多癮君子在此聚集。<sup>⑤</sup> 因此，柔佛古廟及其遊神雖然是新山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此時期被視為一處不安全的地方。（見附圖1）

新山市中心變成如此模樣，與當時新山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有關。如第三節所示，新山和新加坡的經濟自1970年開始快速發展，吸引許多人來到新山定居。雖然新山開始興建許多住宅區，但是始終供不應求，並且很多住宅區

① 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

② 〈新山甘榜彭亨昨凌晨大火 一列蜂巢式房屋被大貨夷為平地〉，《星洲日報》，1973年11月22日，版10；〈新山警方人員兩星期來大局掃蕩艷窟 七四名操醜業男女被捕〉，《南洋商報》，1973年5月8日，版6。

③ 〈警方在新山鹵一假手槍及兩本護照〉，《星洲日報》，1978年4月3日，版7；〈新山警方人員兩星期來大局掃蕩艷窟 七四名操醜業男女被捕〉，《南洋商報》，1973年5月8日，版6；〈柔警方根據可靠情報突襲一甘榜木屋破獲大量迷幻丸〉，《南洋商報》，1975年9月7日，版6；〈一名械劫及販毒遭通緝嫌犯被發現腹受槍傷入新山中央醫院施手術獲救 警方相信與私會黨格鬥有關〉，《南洋商報》，1976年12月30日，版6；〈新山警方扣五人士鹵獲毒品〉，《南洋商報》，1980年2月27日，版5。

④ 〈柔佛古廟風雨亭 變成吸毒者天堂〉，《新明日報》，1986年5月28日，版6。

⑤ 〈嗜毒者常在附近出現 古廟管理人心裡不安〉，《聯合早報》，1991年8月26日，版8。

在1980年代才陸續落成。因此，一些較為貧困的移民與當地居民便在新山市區的甘榜彭亨、古文茶(Kebun Teh)、義興三巷等地聚居，形成貧民窟。其中訪談人 M 移居新山的經歷就是這段歷史的縮影。她與丈夫二人在1970年代先暫居古文茶，直到所購買的房子落成之後才搬離。<sup>86</sup> 雖然政府曾經試圖解決問題，例如興建大批木屋以安頓這些外來移民，但是都無功而返。<sup>87</sup>

隨着甘榜彭亨大火，柔佛古廟周圍開始有所改變，逐漸被納入城市規劃。1981年12月1日，甘榜彭亨忽然發生火災，燒毀70間房屋。<sup>88</sup> 這次火災之後，當地並未像過去一樣很快地再蓋出非法木屋，而是被政府規劃為發展用地。政府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規劃重新發展甘榜彭亨一地，但遲遲未有進展。<sup>89</sup> 柔佛州政府在1977年設立甘榜彭亨委員會，與當地居民商量土地發展一事。<sup>90</sup> 這場火災使得這一切開始加速。政府開始與當地居民商量土地徵用和賠償的問題，並且邀請發展商前來商量如何開發甘榜彭亨一地。<sup>91</sup> 雖然規劃曠日費時，但是最終在1988年開始動工興建購物中心與酒店。<sup>92</sup>

甘榜彭亨的建設發展影響到在其旁邊的柔佛古廟。在1980年公布的新山大藍圖的規劃中，政府要求柔佛古廟的山門必須往內縮，讓道於擴建的馬路。從當時柔佛州議會議長抗議新山市政府沒有好好規劃就蓋大樓，<sup>93</sup> 可知

<sup>86</sup> 訪談人 M 是現今70幾歲，在柔南土生土長的女性。訪談記錄：M，2023年9月22—30日，網絡通訊。

<sup>87</sup> 〈柔州政府刻向中央政府申請 撥出二千萬元經費在新山建臨時長屋〉，《南洋商報》，1980年1月26日，版6。

<sup>88</sup> 〈柔宗教局警方御林軍突擊搜查後 新山甘榜彭亨風化區在烈陽下失火焚為廢墟〉，《星洲日報》，1981年12月2日，版11；〈新山風化區火患無人喪生 吳來興籲圍隔災區防蓋搭非法木屋〉，《星洲日報》，1981年12月3日，版9。

<sup>89</sup> 〈柔政府計劃耗二千萬元 拆建甘榜彭亨地區 為現代商業住宅區〉，《星洲日報》，1970年8月26日，版10。

<sup>90</sup> 〈柔州秘書蘇來曼指出 已訓令新山市會制止甘榜彭亨重成風化區〉，《星洲日報》，1981年12月19日，版47；〈柔擬發展甘榜彭亨〉，《星洲日報》，1982年11月19日，版36；〈邀請私人機構聯合投資 柔發展甘榜彭亨成為新山商業中心〉，《聯合晚報》，1984年10月4日，版8。

<sup>91</sup> 〈新山甘榜彭亨徵用發展 四月十七日商賠償問題〉，《聯合晚報》，1985年3月31日，版5；〈徵用甘榜彭亨土地 柔政府將依市價賠償受影響地主〉，《聯合晚報》，1985年6月25日，版8。

<sup>92</sup> 〈慕尤汀：經濟蓬勃發展將帶來繁榮 新山2000年成為大馬第二大城市〉，《聯合早報》，1988年11月7日，版7。

<sup>93</sup> 〈柔州旅遊促進會主席說 中秋晚會眾神出遊列柔旅遊重要節目〉，《聯合早報》，1989年9月8日，版13。

新山的發展並未按照大藍圖的規劃實行，但是擁有柔佛古廟的新山中華公會已開始着手計劃，保護自己的權益。

當柔佛州政府於1981年在憲報上公布徵用甘榜彭亨的土地重新發展時，新山中華公會已經在同年取得柔佛古廟的正式地契，以保護自己對古廟的擁有權；並在當年5月成立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其目的除了修復古廟，也要求政府不可拆除古廟。<sup>94</sup> 因此，柔佛州政府和新山中華公會為了山門是否拆遷內縮一事，展開長達10年的爭論。

雖然1981年在憲報上得知廟地 Lot 653和 Lot 654會被徵用，但是新山中華公會仍在觀望甘榜彭亨重新發展的計劃如何影響柔佛古廟。1983年，有人提出柔佛古廟是否應該搬遷，使得新山華人社會內部出現兩種意見。其中一種意見是柔佛古廟應該搬離市區，重新在新山市郊建廟；另一種意見則是柔佛古廟應該保留。當兩種意見仍在僵持時，柔佛州政府1985年6月在憲報上正式公布徵用 Lot 653和 Lot 654兩地，並且新山中華公會在當年12月接到柔佛州經濟發展機構的來信，告知柔佛古廟的土地將被徵用，以用於道路擴建。隨後在12月30日，新山中華公會理監事會成立11人小組委員會，向柔佛州務大臣提呈備忘錄並進行對話，以求完整保留柔佛古廟。同時在1986年1月2日，新山中華公會發布文告，表明要保護古廟的完整性，並要求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大眾密切關注柔佛古廟事件的後繼發展。<sup>95</sup> 換言之，當柔佛州政府決定徵用柔佛古廟部分土地時，新山中華公會與新山華人社會也決定完整保留柔佛古廟，並拒絕政府的徵地行動。

新山中華公會態度轉向完整保留柔佛古廟，與當時新山經濟發展和馬來西亞華人主流意見變化有關。1980年到1985年之間，新山經濟蓬勃發展。巴西古當和士乃的工業有顯著發展，並且新加坡經濟起飛也帶動周圍腹地（包括柔佛南部）不斷發展。<sup>96</sup> 如第三節所述，新山是柔南經濟的中心，並為周圍的工業區提供第三級產業的服務，成為柔南經濟與社會的心臟地帶，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具體體現。新山3棟大樓——美倫大廈、敦拉薩大廈和劉南輝大廈——已經蓋好，新山市中心不但出現了最早的大型購物中心，同時新住宅區——例如大馬花園、大豐花園、柔佛再也、皇后花園等——也先後完

<sup>94</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新山：新山中華公會，1997），頁83—85；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

<sup>95</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83—84。

<sup>96</sup> Peter J. Rimmer and Howard Dick, *The City in Southeast Asia: Patterns, Processes and Polic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66-68.

工，新移民不斷湧入新山。隨着柔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新山市中心重新規劃與發展一事也成為必行之事。因此，柔佛古廟的土地被徵用一事並不意外，也可說是馬來西亞經濟蓬勃發展的結果。

另一方面，經濟蓬勃發展，也促成馬來西亞華人對於政治權利的焦慮，進而促成透過文化與政府抗衡。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華人仍然心有餘悸，因此在1970年代時，政治上不再有類似1960年代那般積極推動華語列為國家語言之一的舉動；許多華族年輕人在獨立時期積極學習馬來文以求國家團結的舉動也不復見。<sup>97</sup> 在政治上，華人族群避免和政府及馬來族群正面衝突，因此文化成為抗議政府的手段，文化領域也因此成為政治角力場。此外，當時所強調的華人文化並非要改以華人文化獨大，而是尊重與強調馬來文化的同時，政府也必須尊重與提倡少數族群的文化（例如華人和印度人的文化）。

如此情況之下，自1970年代開始發展的獨中復興運動成為第一個抗爭場域。自1958年改制以來，接受政府津貼的華文學校成為國民型中學，不接受津貼的學校則成為獨立中學。在1960年代，獨中並非許多家長首選，因此許多獨中勉強生存，成為收容政府考試成績不佳者的升學管道，並被人們質疑其是否應該存在。到了1973年，霹靂州展開獨中復興運動以挽救獨中。除了籌款建設硬體設施，也改革教育內容，以求符合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需求。自此，許多華人把文化發展作為抗議政府的戰場。<sup>98</sup> 到了1980年代，作為華人文化象徵的獨中與傳統節日相結合，變成一種另類的抗爭管道。在檳城，各地華人社區會在農曆七月舉辦中元節活動，同時藉此活動為獨中籌款。這不但強化人們對於傳統節日的注重，並且藉此作為宣揚保存華人文化與教育的場域。<sup>99</sup>

進入1980年代，人們對五一三事件的恐懼逐漸退潮，以及經濟的蓬勃發展，促成新一波的文化抗爭的相關運動。馬來西亞政府的國家文化政策以伊斯蘭和馬來文化為主，引起許多華人不滿。因此，馬來西亞十五華團在1983年向政府提交《國家文化備忘錄》，抗議政府的國家文化政策，主張政府也必須尊重與扶持其他少數族群文化與語言教育等。<sup>100</sup> 為了體現這項主張，開

<sup>97</sup> 許德發，《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臺北：時報出版，2022），頁79—111。

<sup>98</sup> 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頁87—158。

<sup>99</sup>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156-181.

<sup>100</sup> 十五華團，《國家文化備忘錄》（1983）。

始舉辦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節，由馬來西亞各地的華人大會堂輪流主辦。從中可見，馬來西亞華人在恐懼逐漸消失之後，把文化作為抗爭場域，強調自己的文化以抗拒國家文化政策。

經濟的蓬勃發展，讓華人社會有更多資源用於文化場域上。經濟蓬勃發展促成土地重新規劃，進而引發文化運動者，不限於新山的柔佛古廟。馬六甲的三寶山也是一處因為經濟發展而可能被政府徵收土地並重新發展的地方。馬六甲政府在1983年10月宣布將徵用三寶山的土地，用於開發商業區和住宅區。此宣布震驚馬六甲華人社會，並促成當地華人自1984年起抗議州政府的舉動，最終使得這項重建計劃不得不終止。雖然未有直接證據顯示馬六甲三寶山運動影響新山中華公會保留古廟的決定，但是當時三寶山運動的爭議受到媒體長期關注並大肆報導，相關消息也不斷在華社中流傳。因此，放入此時空脈絡觀之，與馬六甲三寶山面臨相同困境的柔佛古廟，不免受到前者的影響，進而非常可能促成新山中華公會決定保存柔佛古廟。

除了華人文化節的舉行與馬六甲三寶山的抗爭，另一促成新山中華公會走向要求保留柔佛古廟路線的因素，可能是他們與政府的良好關係。如前文所述，新山中華公會與柔佛州政府關係良好，許多新山中華公會高層是馬華公會的黨員；又或者因為經商關係，而與政府交好。<sup>⑩</sup> 他們可能因此認為，透過這些良好關係，可以和政府談判，讓新山中華公會在保存柔佛古廟一事上，能夠取得最大的利益。從當時的報導可知，政府對於他們的要求也放軟姿態，答應他們可能會讓步，保存柔佛古廟。

換言之，1980年代經濟蓬勃發展促成許多地方開始進一步開發，並在此過程中觸及文物與文化保留的問題。華人社會也因為政府積極推動國家文化政策，而對自身文化有所焦慮，所以涉及是否保留被視為華人文化一部分的建築或文物時，容易引發抗爭運動。此外，因為經濟蓬勃發展，所以人們有更多資源投入文物與文化的保存上。再加上當時華人社會逐漸走出對五一三事件的恐懼，以及新山華人社會與政府關係良好，讓新山中華公會有信心可以說服政府答應他們保留古廟的山門。

對於新山中華公會的要求，政府在1988年到1990年之間給予正面回應，但是焦點始終模糊。1988年柔佛州行政議員<sup>⑪</sup> 劉文豐在出席某公眾場合時，建議柔佛州政府應把柔佛古廟「列入發展藍圖中，而加以保存和發展」。他

---

<sup>⑩</sup> 莊仁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與政治參與調查——以柔南地區華人社會為例〉。

<sup>⑪</sup> 行政議員相當於州政府內閣的部長。

認為柔佛古廟具有歷史價值，因此能夠吸引觀光客前來。<sup>103</sup>一年後，劉文豐再度表示，新山柔佛古廟遊神與中秋園游晚會被列為柔佛州重要的旅遊節目。<sup>104</sup>除了州政府有所反應之外，中央政府也有所表示。1988年，時任副教育部長雲時進說，首相署已經答應撥款10萬元資助新山中華公會修復柔佛古廟，但是必須在同一年內花完這筆預算，不然這筆撥款將會收回。<sup>105</sup>同一年的農曆新年大年初一時，時任柔佛州州務大臣慕尤丁(Muhyiddin bin Haji Muhammad Yassin)前往參與新山中華公會農曆新年團拜，時任新山中華公會會長的劉南輝要求政府撥款協助修復古廟，慕尤丁則建議「成立保留古廟基金委員會，發展及重修古廟委員會」。<sup>106</sup>這些回應皆可說是中央與州政府正面回應新山中華公會的訴求，同意保留柔佛古廟，但是對於雙方爭議的重點——是否保留柔佛古廟的山門——則沒有任何交集。

直到1990年10月，慕尤丁才正面回應是否保留柔佛古廟的山門。在致信土地局的公函中，慕尤丁撤銷在9月19日要求新山中華公會必須自行拆除柔佛古廟山門一事，並要求中華公會把之前的徵地賠償返還州政府。<sup>107</sup>但是如此決定，是因為當時的馬來西亞快要舉行全國選舉（選舉是在1990年10月20至21日舉行），中央政府與柔佛州政府都面臨選舉壓力。當時巫統分裂，並且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在茅草行動<sup>108</sup>之後對於國陣政府的支持度大幅度下降，因此中央與柔佛州政府都面臨是否能夠繼續執政的問題。因此，透過答應保留柔佛古廟的山門，可確保新山的華人選票倒向國陣。特別是新山中華公會召開記者會公布此一消息時，除了新山中華公会的代表，還有很多國陣候選人一同參與，可見其拉攏華人選票的用意。

當政府正面表示可保留柔佛古廟（但是是否保留山門則含糊其辭），新山中華公會也積極推動柔佛古廟保留運動時，柔佛古廟遊神也恰好再度獲得

<sup>103</sup> 〈州行政議員劉文豐 建議柔政府保存具有歷史性古廟〉，《聯合早報》，1988年2月3日，版23。

<sup>104</sup> 〈柔州旅遊促進會主席說 中秋晚會眾神出遊列柔旅遊重要節目〉，《聯合早報》，1989年9月8日，版13。

<sup>105</sup> 〈政府撥款十萬重修柔佛古廟〉，《聯合早報》，1988年3月5日，版15。

<sup>106</sup> 〈政府撥款十萬重修柔佛古廟〉，《聯合早報》，1988年3月5日，版15。

<sup>107</sup> 〈土地賠償金須還州政府 柔佛古廟、圍牆不必拆〉，《聯合晚報》，1990年10月15日，版12；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87。

<sup>108</sup> 1987年，馬來西亞警方根據《馬來西亞內安法令》，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107名朝野政黨領袖、華教人士與社運分子等，並且《星洲日報》《星報(The Star)》和《祖國日報(Watan)》被勒令關閉。

眾人的矚目。柔佛古廟及其遊神在當時予人的印象並不好。在1980年代，就有不少民眾對於古廟有癮君子聚集仍感到憂慮，並且常常成為新聞報導的焦點。<sup>109</sup> 根據訪談人 M 所述，當時新山不只是鄰近甘榜彭亨的柔佛古廟，許多貧民窟如義興三巷和古文茶等都有癮君子聚集，因此人們對於人身安全，特別是兒童的人身安全，感到憂慮。<sup>110</sup> 另一方面，提及遊神時，也不免提到扒手和各種搶劫。例如在1982年，就有報導指出有新加坡人在觀看遊神回家時遇到劫匪而破財；<sup>111</sup> 甚至在1992年，也有報導指出扒手在柔佛古廟遊神活動中出沒，不少人遭殃。<sup>112</sup>

雖然柔佛古廟及其遊神給人觀感不佳，但是其參與人數在1980年代卻開始上升。1978年的報導中，指出古廟遊神有上千人參與；到了1991年的新聞報導，則指出有上萬人參與柔佛古廟遊神。<sup>113</sup>

另一方面，當時開始流傳的傳聞，也促成許多人參與遊神活動。當時有人說有一位乞丐因為參與遊神，去抬神轎，因此翻身成為富翁。其他的版本則說一個窮人因為抬了神轎而翻身成為富翁；也有的故事版本不提及求取財富，但說抬神轎可以保佑平安健康等等。也有的版本說不可只是抬一次神轎，而必須連續3年去抬神轎，才能夠得到神明的祝福而成為富翁或保佑平安健康。不論傳聞是否屬實，這些故事刺激人們參與柔佛古廟遊神活動。<sup>114</sup> 因此，在這些故事流傳之下，越來越多人參與古廟遊神活動，再加上柔佛古廟因為山門拆遷的爭議，讓柔佛古廟及其遊神受到廣泛關注。

除了古廟遊神，也有其他文化活動借用柔佛古廟的場地來進行，以凸顯柔佛古廟在新山華人文化中的位置。例如在新山於1988年4月舉辦的全國舞蹈節，開幕式就選擇在柔佛古廟內開幕；1989年動地吟詩歌朗誦會，也在柔佛古廟進行。<sup>115</sup> 此外，因為舞蹈節的啟發，二十四節令鼓也因此誕生。新山中

<sup>109</sup> 〈柔佛古廟風雨亭 變成吸毒者天堂〉，《新明日報》，1986年5月28日，版6。

<sup>110</sup> 訪談記錄：M，2023年9月22—30日，網絡通訊。

<sup>111</sup> 〈觀賞柔佛古廟眾神出遊後興盡而歸 新加坡商人遭三歹徒洗劫掠去現款金項鍊逾一千元〉，《南洋商報》，1982年2月17日，版7。

<sup>112</sup> 〈古廟眾神夜遊日扒手趁機撈世界〉，《聯合早報》，1992年2月27日，版10。

<sup>113</sup> 〈柔佛古廟 諸神出遊 經已結束〉，《星洲日報》，1978年3月1日，版7；〈柔佛古廟眾神出遊〉，《聯合早報》，1991年3月9日，版9。

<sup>114</sup> 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頁61。

<sup>115</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85—86；第九屆全國舞蹈節工委會，《九舞：第九屆全國舞蹈節》（新山，1988）。

華公會在1988年6月的端午節邀請10位書法家，在柔佛古廟揮毫，象徵二十四節令鼓成立。<sup>116</sup>

這些活動的背後都可見到新山華人社會菁英的積極參與，也可見到經濟富裕與政治因素使得人們有資源資助大量文化活動。新山華社菁英在州政府通知將拆除古廟山門之後，開始關注古廟，同時也積極把許多文化活動移至柔佛古廟進行。這些活動都宣示着柔佛古廟與新山華社菁英之間的關係再度變得緊密，柔佛古廟及其遊神也被種族化，成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代表之一；同時藉助這些活動，柔佛古廟及其遊神擺脫過去的低俗草莽並且實現階級上升，從癡君子聚集地一躍成為華人文化的聖地。

另一方面，不論是舉辦舞蹈節或者成立二十四節令鼓，都獲得新山華人團體的資助。新山客屬同源社（今日的新山客家公會）、新山福建會館、新山瓊州會館、新山福州十邑會館、新山中華商會、新山樹膠商會、寬柔校友會等新山華人團體出現在當時全國舞蹈節的贊助人與團體名單中。根據訪談人L的記憶，第一支二十四節令鼓隊（按：新山寬柔中學二十四節令鼓）的買鼓費用則是由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sup>117</sup>所出。從此二事可見，許多新山華人團體在經濟上已有餘力並樂意資助舞蹈節等文化活動的進行。如前所述，文化活動成為表達對政府不滿與抗議的場域，因此資助這些文化活動，也可表達對政府的國家文化政策和新經濟政策的不滿。

當事情似乎平息之際，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邀請多位歷史與建築專家考察柔佛古廟，為修復柔佛古廟做準備。這些專家都指出柔佛古廟是一座歷史悠久且值得保存的廟宇，認為不應該拆除而應該好好修復。<sup>118</sup>雖然這些專家對古廟建築年份的判斷不一定正確，但是他們指出古廟的重要性且歷史悠久，不免提升古廟的文化與歷史地位，並且獲得專家學者的背書保證。此外，新山中華公會花費巨款邀請專家和修復古廟，如果當時不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也無法成行。

<sup>116</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85—86；安煥然，《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新山：南方大學學院出版社，2017），頁236—238。

<sup>117</sup> 五幫會館是指新山潮州八邑會館、新山客家公會、新山福建會館、新山廣肇會館和新山海南會館。他們代表新山華人5個主流方言群，與新山中華公會關係良好，亦是其重要的團體會員。見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頁56—57。

<sup>118</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61—70。

1991年，柔佛古廟山門事件再度爆發。7月22日，州務大臣慕尤丁出席柔佛州土地資源理事會會議後，透過記者向新山中華公會要求拆除柔佛古廟的圍牆，讓出部分土地供道路拓寬工程；並且表示這是州政府最後一次呼籲，新山中華公會必須聽從政府的指令。<sup>119</sup> 對於柔佛州政府忽然改變主意，時任新山中華會長郭鶴堯表示事前不知情；修復委員會秘書陳燕鳴表示，新山中華公會尚未收到公函，因此不發表意見。<sup>120</sup> 這些顯示新山中華公會諸公對此並無任何準備。

州政府自1991年7月態度轉為強硬，並在1991年年底強行拆除古廟圍牆。面對政府不讓步，郭鶴堯因此引咎辭去中華公會會長一職。<sup>121</sup> 雖然繼任的中華公會會長曾振強也再度呼籲政府信守選舉時的承諾，但是政府態度並未趨軟，反而越加強硬。例如新山市議會副主席在11月30日要求新山中華公會必須拆除柔佛古廟的圍牆，並且不再給予任何通知。<sup>122</sup> 到最後，即使中華公會派人日夜守護古廟山門，<sup>123</sup> 卻仍然無法改變政府的決定，柔佛古廟的山門最終被政府強行拆除。<sup>124</sup>

古廟的圍牆被拆除之後，新山中華公會緊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抗議政府做法，並在同年的新春團拜上違反過去的傳統，不邀請州務大臣出席，以示抗議。但是中華公會隨後在1992年5月再度召開特大，決議之前的特大不合法，並且擱置尚未執行的決議案，柔佛古廟山門事件到此結束。<sup>125</sup>

古廟山門被拆除之後，對於古廟遊神並無影響。1992年的遊神依舊獲得警察的批准，除了不可針對敏感性議題宣傳之外，其他規定也無太大改變。同年遊神也有許多人參與，整場遊神活動順利進行，並無紛爭。<sup>126</sup>

<sup>119</sup> 〈州政府作出最後呼籲 柔佛古廟圍牆應拆除或向後移〉，《聯合早報》，1991年7月23日，版11。

<sup>120</sup> 〈新山中華公會會長郭鶴堯說 柔佛古廟圍牆後移問題公會收到公函才會討論〉，《聯合早報》，1991年7月24日，版11。

<sup>121</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90。

<sup>122</sup> 〈柔州經濟發展機構不介入古廟圍牆糾紛〉，《聯合早報》，1991年7月26日，版16；〈中華公會會長曾振強 柔州政府應守諾言不要拆除古廟圍牆〉，《聯合早報》，1991年12月6日，版12。

<sup>123</sup> 〈柔古廟風波吃緊 為保山門不拆華社日夜守廟〉，《聯合晚報》，1991年12月27日，版9。

<sup>124</sup> 〈新山古廟山門被拆〉，《聯合晚報》，1991年12月29日，版1。

<sup>125</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88—98。

<sup>126</sup> 〈柔古廟遊神獲批准〉，《聯合早報》，1992年2月22日，版11；〈柔古廟眾神出遊盛況不減當年〉，《聯合早報》，1992年2月25日，版9。

柔佛古廟圍牆被拆除，也促使人們開始加速修復柔佛古廟，改變柔佛古廟的管理方式。柔佛古廟的修復申請在1994年2月獲得政府通過，並於同年8月開始進行修復工作。歷經兩年的修復工作，柔佛古廟的修復工程在1996年8月完工，並在11月舉行神明回駕慶典，宣告古廟從山門事件初始到被拆除，到古廟修復等一連串事件正式告一段落。<sup>127</sup> 此外，完工之後的古廟，不再由廟祝管理，而改由古廟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sup>128</sup> 這也顯示新山華人社會的菁英進一步涉入古廟的管理，古廟與華社菁英的關係更為緊密。

柔佛古廟山門事件結束，柔佛古廟遊神繼續蓬勃發展，其參與人數不斷上漲，活動也更加熱鬧。因此，為了吸引遊客，柔佛古廟管委會在1999年為古廟遊神增設亮燈儀式，使得古廟遊神從原先的4天變成5天。<sup>129</sup> 從中可見，經濟因素如何導致文化活動內容的增加。

在1980年代之前，柔佛古廟及其遊神並未獲得太多的關注，但是隨着經濟與政治在1980年到2000年之間的變遷，促使柔佛古廟及其遊神活動被種族化/華族化，成為新山華人社會的重要文化象徵。隨着新山和新加坡經濟起飛，新山市區開始蓬勃發展。柔佛古廟旁的甘榜彭亨被燒毀，促使柔佛州政府加快腳步重新規劃市區，結果導致柔佛古廟山門所在地段被政府徵用。另一方面，經歷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華人開始重拾信心。在1970年代展開獨中復興運動，在1983年發表《國家文化備忘錄》反對政府的國家文化政策；同時各地華人社會也以文化作為抗爭場域，抗議政府，例如馬六甲華人社會不滿州政府試圖徵用三寶山的土地以供未來市區發展，因此展開保育三寶山這座作為馬六甲華人文化象徵的墳場。在如此情況下，新山中華公會不順從政府意見拆除山門，而是積極要求政府視柔佛古廟為華人文化象徵，並保留山門。在這抗爭階段中，可見柔佛古廟成為許多華人文化活動的進行地點；許多人也因為當時新興的「參與遊神去抬神轎可致富報平安」的傳聞，或者因為古廟山門事件而開始關注遊神並進而參與，使得柔佛古廟遊神的參與人數從千人上漲至萬人，到今日甚至成為幾十萬人參與的大型文化活動，並成為新山華人社會重要的文化活動與象徵。從柔佛古廟這個案中可見，馬來西亞從1970年到2000年之間的政治與經濟的變遷，如何改變了文化。

<sup>127</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99—102。

<sup>128</sup>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柔佛古廟專輯》，頁85。

<sup>129</sup> 莊仁傑，〈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

## 六、結論

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影響，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自1970年來產生極大變化。但是，過去的研究主要強調從全國性的角度觀察，或者只以馬來半島中北部的地方華人社會作為研究個案；又或者只強調原因與結果，而忽略這一變遷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如何逐步塑造華人文化，促成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變成今日模樣。從馬來半島南部的新山華人文化——特別是當地的寬柔中學與柔佛古廟及其遊神——自1970年以來的變遷，可看見政治與經濟如何導致寬柔中學人數大增，並且得到華人社會的大力支持與捐款，同時政治與經濟發展也改變新山市中心，促使市區重新規劃，進而導致新山柔佛古廟成為當地華人文化的焦點。

五一三事件是所有事情變化的重要導火線。由於1969年大選結果，促成吉隆坡的華人與馬來族群發生流血衝突，導致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政府事後探討五一三事件的爆發原因，認為原因是馬來人在經濟上的落後，因此決議實行新經濟政策，透過政策給予馬來族群更多的經濟機會，同時擴大經濟規模，讓其他族群不會因此而有所損失。這些政策最終目的是縮小各族之間在經濟等方面的落差，以塑造更加平等的社會。

馬來西亞自1971年展開第二大馬計劃以來，希望透過加速各地的工業化，促成馬來西亞經濟快速發展，並落實新經濟政策的目標。柔佛是當時經濟發展的重心之一，特別是以新山為中心的柔佛南部。當時在巴西古當設立工業區，吸引大量移民入住；同時也在巴西古當設立海港，隨後建設可以處理危險液體的碼頭設備等等，使得巴西古當成為石油工業中心。另一方面，在新山北部的士乃建立機場，並在士乃與淡杯設立工業區。這些措施促成柔南逐漸成為工業地帶。再加上當時新加坡經濟蓬勃發展，使得許多馬來西亞人到新加坡工作，並在鄰近的新山定居。

這些變化使得新山經濟開始蓬勃發展。位於柔南中心的新山為周圍的巴西古當與士乃等地提供金融等第三級產業服務，同時也因為新加坡和周圍地區快速發展的關係，人口大量增加，促成新山及其郊區自1970年代末以來出現許多新興住宅區。其中在市中心的美倫大廈、敦拉薩大廈和劉南輝大廈也在1970年代先後落成，象徵着新山經濟蓬勃發展、欣欣向榮，許多商人也因此大發利市。

但是正向發展之餘也有些負面之事。自五一三事件發生以來，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色彩更加濃厚。自1950年代起，階級與階級鬥爭等思維因為反共

而被禁止；五一三事件之後，許多強調階級鬥爭的政黨逐漸衰微，或者改以族群語言包裝以拉攏選民。如此情況下，族群政治成為主流，並且深刻影響人們的思考。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在1971年宣佈的國家文化政策即以伊斯蘭和馬來文化為中心，而忽視其他族群文化與宗教的重要性。這給予人們一個印象：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嘗試抹除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特色，建立以伊斯蘭和馬來人為尊的社會。不只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經濟上的土著（馬來人）優先政策也逐步落實。例如敦拉薩大廈有好些店鋪優先保留予土著，同時在店鋪的租金和賣價方面也給予土著極大的優惠。這些雖然有助於縮小馬來族群與其他族群的經濟落差，但總讓其他族群感到不滿，認為政府薄待非馬來族群。

這些發展對於新山華人社會有不小的衝擊。新山華人菁英與國陣政府素來交好，甚至有部分人士是政府中的一員；並且在五一三事件後，柔佛州的華人菁英共同表態支持國陣中央政府。可是，在表態時的字裡行間，也顯示他們對於此事件的震驚，並且擔心自己是否會被進一步打壓。

當華人社會對五一三事件的憂慮逐漸消除，以及經濟日漸蓬勃發展，促成華人有更多資源和意識強調自己在國家政治與文化上的權利與地位。由於國家文化政策強調單元，許多華人擔心華人文化將之不存。隨着對五一三的憂慮漸遠且經濟能力提升，華人開始強調自己的文化權利，因此獨中復興運動在1970年代開始興起，並且十五華團在1983年提呈《國家文化備忘錄》，要求政府重視他族文化。

這些事情也在新山發生。在獨中復興運動起於北馬之際，新山因為華人口大增，以及國家文化政策的影響，促成許多華人家長把小孩送往當地的獨中——寬柔中學——接受華文教育，以保留華人文化。在這波發展之下，寬中除了進行教育改革以提升教育水平，也開始積極募款以建設新校舍來應對急劇上升的學生人數。在這波募款運動當中，許多因為新山快速發展而致富的華人富商大力捐助，例如郭氏家族、鄭鏡鴻、蕭曉香等，促成寬柔中學得以大興土木建設校園。此現象的發生，得力於兩大因素：國家文化政策的頒布催生華人的文化焦慮，進而導致華人家長送小孩到獨中念書，寬柔中學的學生人數因此大增；由於柔佛南部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促成新山華人日漸富裕，有能力支持寬中建設校園。所以，寬柔自1970年代以來大興土木的校園建設工程，是當時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結果。

另一更加體現政治與經濟影響文化的個案是新山柔佛古廟及其遊神。自國家文化政策頒布以來，不但激起華人對於自身文化的憂慮，也刺激華人族

群對自身權利與地位的思考。因此《國家文化備忘錄》的提呈，以及積極保存三寶山與柔佛古廟，都一再揭示華人以文化作為抗爭場域；其目的不單是保留自己的文化，也以此彰顯自己在國家的權利。當新山市區蓬勃發展，州政府重新規劃以利未來發展時，要求柔佛古廟拆除山門讓出部分土地供未來發展。這雖然是因為當時經濟蓬勃發展的結果，卻因為當時華人憂慮自己的文化保存與權利，再加上三寶山保育運動的刺激，導致柔佛古廟及其遊神這一文化場域成為政府與人民交鋒之地。

在這種情況下，柔佛古廟成為當時許多文化活動的舉辦場地，古廟遊神活動也吸引更多人來參與。當時的全國舞蹈節、中秋晚會、動地吟等新山華人文化活動，都選擇在柔佛古廟開幕或進行。這使得過去被視為癮君子場所而人們少去、華人菁英也不願多加干涉的柔佛古廟，被種族化/華族化，並成為新山華人文化的象徵。柔佛古廟遊神也因為古廟文化地位上升，被視為華人文化的代表，因此吸引許多人前往參與。更因為當時流傳參與古廟遊神並抬神轎將帶來財富、健康與平安，讓更多人樂意參加遊神。自此，古廟遊神活動從1970年代末的數千人參與，逐漸變成1990年代萬人參與的活動，時至今日更是幾十萬人參與的大型盛事，甚至因此多加一天的亮燈儀式，以吸引更多參與。從這過程中，可看出柔佛古廟因為經濟發展而面臨山門被拆除的問題，但因為當時華人的文化焦慮與積極保護自身文化的關係，導致過去被忽略的柔佛古廟受到新山華人菁英與大眾的關注，進而促成古廟及其遊神在文化上地位提升，變成新山華人文化的象徵。

從1970年到2000年之間的新山華人社會的文化變遷中，可以看見政治與經濟發揮極大影響力。如果缺乏華人自五一三事件和國家文化政策頒布以來的文化焦慮，就難以促成之後的文化建構過程。如果缺乏第二大馬計劃以來的種種經濟發展，以及新加坡經濟起飛為柔南地區——特別是新山——帶來的經濟效益，就不會導致新山華人人口大增而使得寬柔中學人數大增，進而需要大量捐款建設校園，也不會促成新山市區需要重新規劃，進而引發柔佛古廟山門事件，以及後繼的柔佛古廟及其遊神的復興。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摻雜政治所導致的文化焦慮，但是如果缺乏這些經濟發展，新山華人社會也無充足資源支持新山華人文化的建構與發展，也不會導致新山華人文化變成今日模樣。

類似的事情在馬來西亞常常可見，更非華人所獨有。當馬來西亞經濟日益發達，文化卻隨之伊斯蘭化，並強調要回歸伊斯蘭。許多政治人物也紛紛響應，例如伊斯蘭黨即常常要求必須回歸伊斯蘭的本質，或者指責其他穆斯

林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行為等等。<sup>⑬</sup> 如此情況之下，馬來傳統中的竹馬舞 (Kuda Kepang) 則被官方禁止，皮影戲 (Mak Yong) 的表演曲目也因此限縮。<sup>⑭</sup> 因此，當今新山華人文化的建構過程只是眾多個案之一，不論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還是馬來西亞各種文化的變遷過程，都深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而這仍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各地文化建構過程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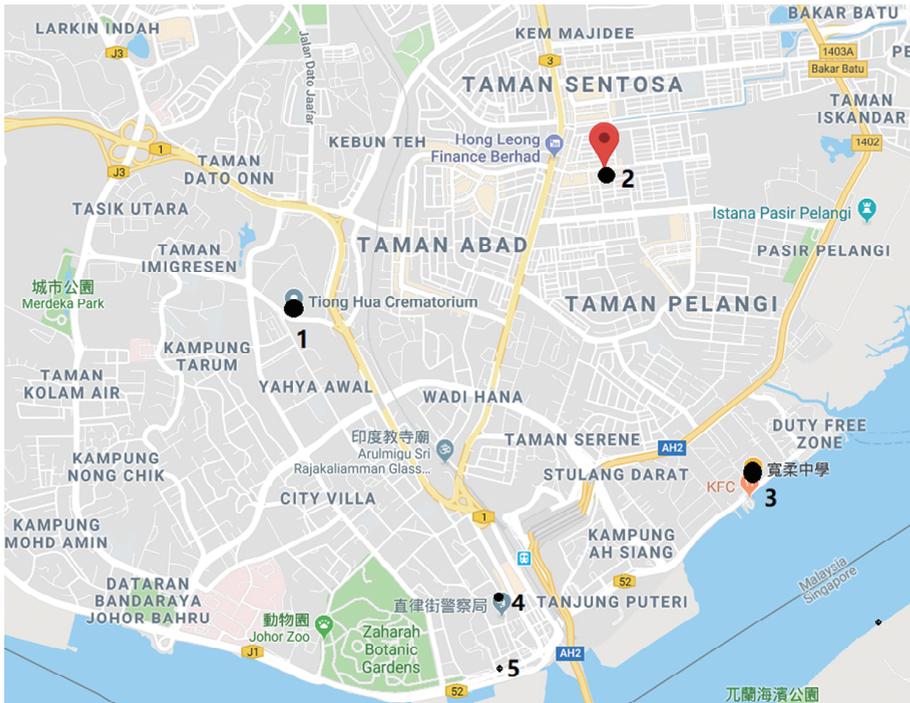
( 責任編輯：武勇；實習編輯：陳子揚、郭安寧 )

---

<sup>⑬</sup> 王思琦，〈哈迪阿旺：反對黨選區撥款備忘錄 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和民主原則〉，《東方日報》，2024年9月15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4/09/15/679837>。

<sup>⑭</sup> Qamar Jannah Fateen, “The Forbidden Cultural Arts: Mak Yong & Kuda Kepang,” *The Karyawan*, 30 October, 2024, <https://karyawan.sg/the-forbidden-cultural-arts-mak-yong-kuda-kepeng/>.

附圖1：新山華人機構所在位置圖



- 1 綿裕亭 (游神時的行宮也在同一處)
- 2 新山中華公會
- 3 寬柔中學
- 4 柔佛古廟 (寬柔學校舊址在其旁)
- 5 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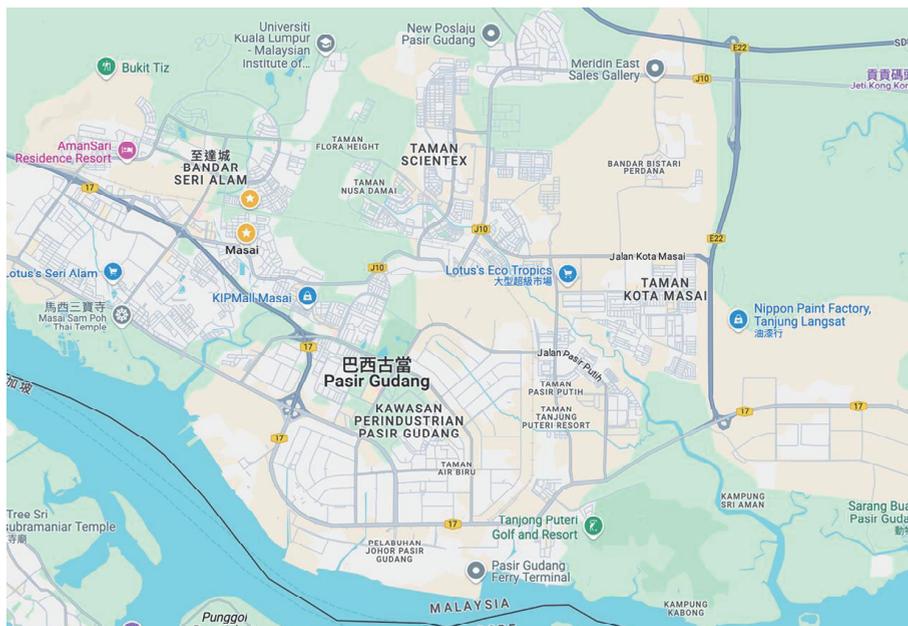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本圖由筆者以谷歌地圖為底圖標注。

附圖2：新山、士乃與巴西古當位置示意圖 (紅色框線所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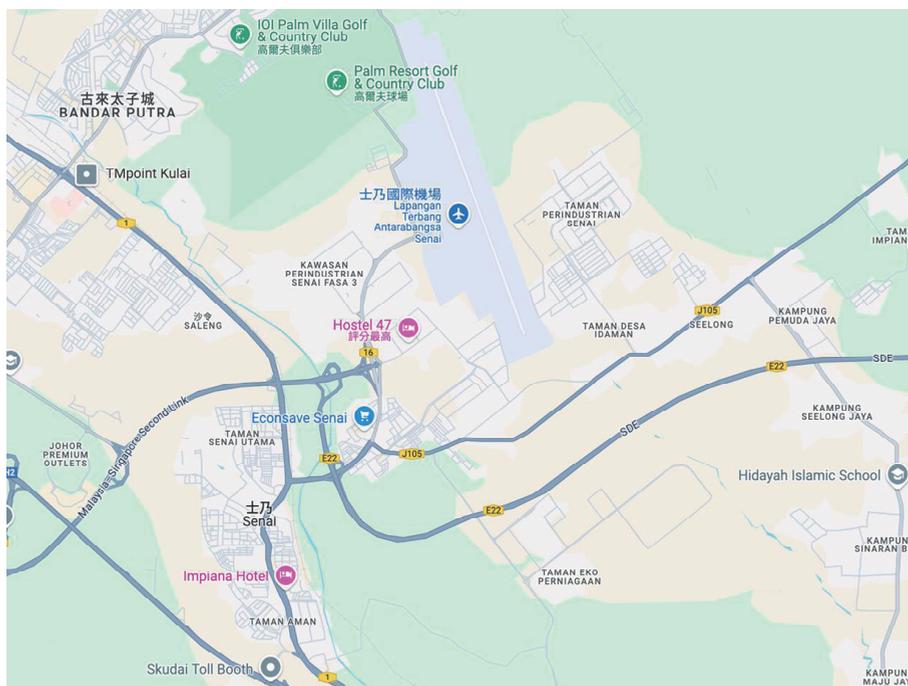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本圖由筆者以谷歌地圖為底圖標注。

附圖3：巴西古當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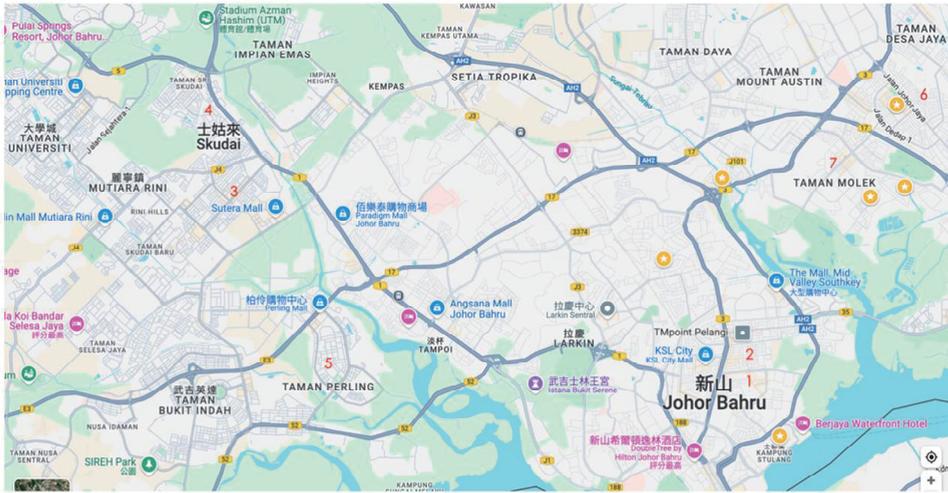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Google Maps。

附圖4：士乃地圖



圖片來源：Google Maps。

附圖5：新山住宅區所在位置圖



- 1 彩虹花園
- 2 大馬花園
- 3 皇后花園
- 4 東方花園
- 5 柏伶花園
- 6 柔佛再也
- 7 百合花園

圖片說明：本圖由筆者以谷歌地圖為底圖標注。

附表1 柔佛州人口及其華人口（1981—2001）

年份	柔佛州總人口	柔佛州華人口
1981年	1, 689, 300	648, 200
1991年	2, 188, 100	762, 700
2001年	2, 829, 900	939, 100
2011年	3, 410, 500	1, 049, 900
2021年	4, 020, 000	1, 211, 500

資料來源：Population Table: States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state?state=johor&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state?state=johor&visual=table)).

附表2：新山縣與古來縣總人口及其華人人人口（1991—2021）

年份	新山縣總人口	新山縣華人人口	古來縣總人口	古來縣華人人口
1991年	704, 471	270, 516	-	-
2021年	905, 600	312, 600	328, 200	95, 700

資料來源：“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1991,”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1/0001046; Population Tabl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Johor Bahru),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johor-bahru&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johor-bahru&visual=table)); Population Tabl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Kulai) ([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kulai&visual=table](https://open.dosm.gov.my/data-catalogue/population_district?state=johor&district=kulai&visual=table)).

附表3：寬柔中學學生人數統計表（1971—2000）

年份	學生人數	年份	學生人數	年份	學生人數
1971	1, 409	1981	4, 343	1991	5, 459
1972	1, 573	1982	4, 531	1992	5, 657
1973	1, 845	1983	4, 688	1993	5, 811
1974	2, 180	1984	4, 881	1994	6, 031
1975	2, 537	1985	5, 035	1995	6, 222
1976	2, 902	1986	5, 063	1996	6, 268
1977	3, 091	1987	5, 194	1997	6, 313
1978	3, 475	1988	5, 259	1998	6, 428
1979	4, 097	1989	5, 335	1999	6, 477
1980	4, 154	1990	5, 489	2000	6, 650

資料來源：鄭良樹、安煥然，《寬柔紀事本末》（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5），頁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Foon Yew High School and the Johor Chinese Old Temple and its Chingay Procession as Case Studies (1970-2000)

Henry CHONG Ren Jie  
Independent Scholar

##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has utilize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as a weapon to protest agains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s National Culture Policy.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results of Chines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but no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hind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Johor Bahru Chinese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It discusses ho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tween 1970 and 2000 affected the expansion of Foon Yew High School in Johor Bahru. It also examin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Johor Chinese Old Temple and its Chingay procession since the 1980s. It shows how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Malaysia, especially in Johor Bahru, determined the content of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shaping it step by step.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Malaysia, it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highlight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Johor Chinese Old Temple, Foon Yew High School, politics, economy